

西南大学记忆

◆ 名师风采

张敷荣先生的人生观

我的父亲侯光炯（下）

◆ 档案拾遗

校档中的张敷荣

刘尊一自传（上）

◆ 校史校情

西南大学寻根（之三）

求真 求实 解校史谜团



主办：西南大学档案馆
校史研究室

2009年第3期

（总第4期）



程序教学

(A Textbook of) Programmed Instruction

By S. S. Chauhan. 1978, Sterling Publishers Pvt. Ltd. 1978

教育工艺学在最近十年有巨大的生长。新教育解释为个体和社会生活的一种自觉有目的的行为。自我优化 (self-optimisation) 的过程。工艺学可以解释为, 旨在帮助人们参加和利用环境的种种活动的编制。它不同于教育, 它不包含属于传统课程观念的任何必然的操控规范。教育工艺学是工艺学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 其目的在于改进教学过程。它可以解释为提高教学过程的效率、方法、技术与教具的发展应用与评价。(P.4) 教育工艺学有大规模、长时期的设施; 教育工艺学则是短时期的、小规模设施。

(2) 教育工艺学的目标 在美国, 人们把教育工艺学的效益概述为: “该教育能培养越来越多的个人, 给教育提供系统的有基础, 并使之更有教育, 学习更为确切, 教育更接近平等。” (P.6引自) 贾森 (H. Jason) 认为工艺学有四个用途: ①传播知识; ②当作典型角色; ③有助于特殊技术的练习; ④为反馈提供准备。马坎兹 (Mackenzie) 认为教育工艺学有四个主要目的: ①满足更多学生的必要 (必须面向更多的学生); ②提供 (对地) 更好的学习材料; ③为独立钻研

ch032.o7.32.12

张敷荣译《程序教学》手稿扉页。《程序教学》一书系印度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大学教材之一, 作者S.S乔汉博士, 曾任印度希姆拉师范学院教育学副教授。1988年, 张敷荣先生和弟子吴定初为了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和教学的需要, 着手翻译此书, 并与该年10月完成了翻译任务, 译著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

(资料来源: 西南大学档案馆)

张敷荣教学卡片手稿

评议：张武升 《小学历史教学教育性因素的培养与评价
的实验研究》

- 一、论文总结了古今中外有关教育(教学)性因素培养和评价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小学历史教学为例通过实验检验,提出培养和评价教学中教育性的原则方法,对我国学校的教学实践及教改有比较积极的意义。
- 二、作者通过有关文献的分析,洞悉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有两种偏向:一是满足于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抽象概括而不深入探究其组成要素,并发挥各要素的功能,以提高教育系统的总体功能;另一方面是看不到教育教育系统各要素间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

张敷荣对学生张武升论文《小学历史教学教育性因素的培养与评价的实验研究》的评议

教育评价

(公元606年)

- (一) 教育评价的发展史: (1) 传统考试阶段(本世纪初)我国随汉武帝二年开科取士;英国剑桥大学开始笔试。(2) 测验运动阶段(上世纪末至本世纪30年代初)法国比纳开始智力测验;英国高尔顿的个别差异测验;比纳西蒙 1905年制成智力测验量表;美国卡特尔是教育测验的创造者。(3) 教育评价理论形成阶段(30年代到50年代)美国1933年开始的“十年研究”后,泰勒为制定教育评价理论和模式,奠定了现代教育评价理论基础。(4) 教育评价理论繁荣阶段(60年代以来)50年代末泰勒模式受批判(忽视教育目标为评价和决策);斯塔弗尔比姆和库特1966年提出CIPP模式(含背景评价、输入评价、过程评价、结果评价);60年代后广泛运用计算机步测量、测验技术、因素分析技术、统计处理。
- (二) 教育评价理论的基本框架: (1) 涉外框架(评价涉及的学科和科目,以教育测量学、教育测验学、教育统计学、电子计算机、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 (2) 内部框架(概括各种不同理论模式和斯塔弗尔比姆和库特10个问题的形式勾勒出现代评价理论的内部框架: ① 评价的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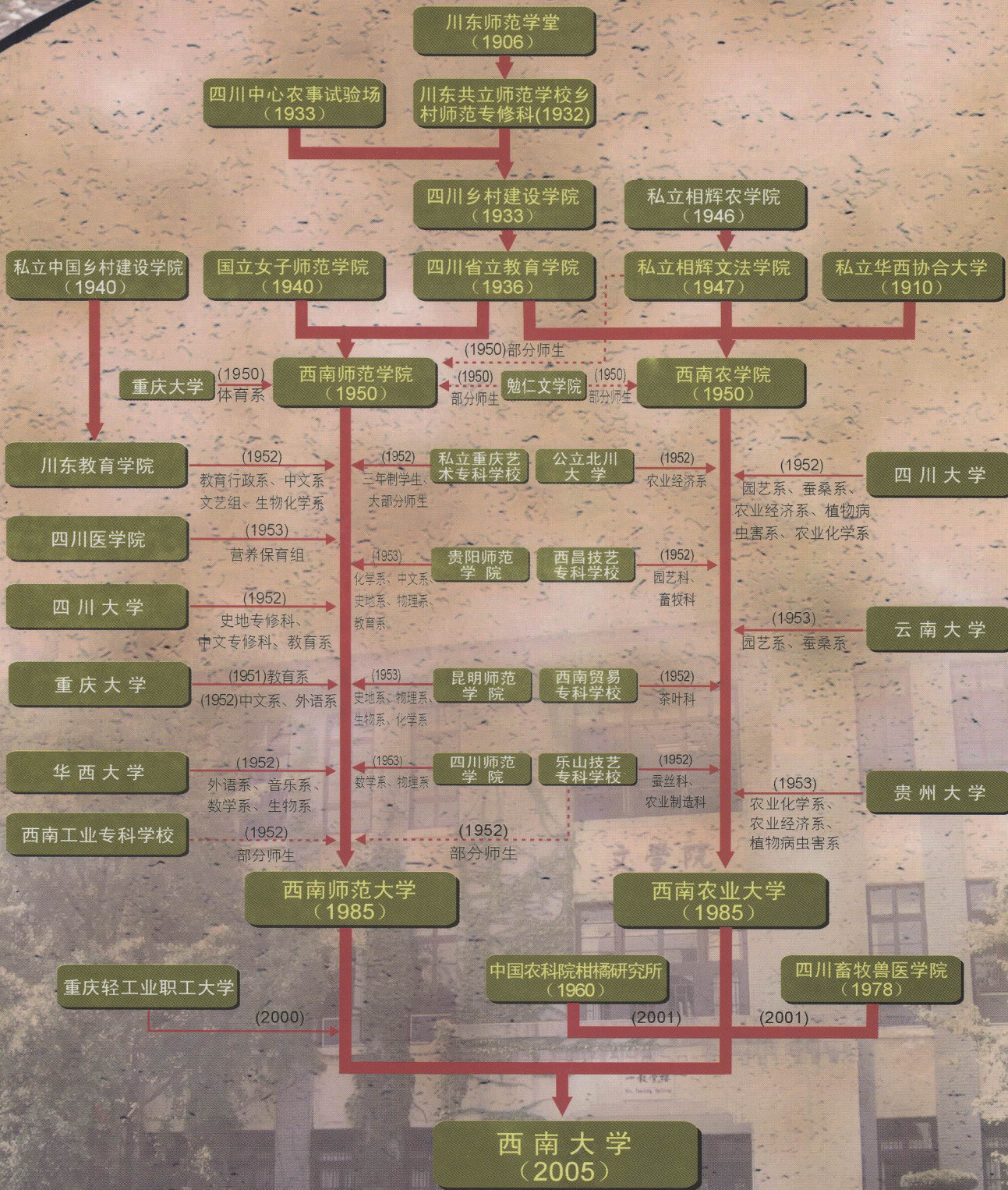
张敷荣讲授《教育评价》的教学笔记手稿



历史沿革

LISHI

YANGE



(注：2008年12月，西南大学档案馆经广泛查阅资料，修订并完善了西南大学发展沿革图)

刊首语

我过去为教育争经费，现中央和地方都重视教育了，我今后要为学校用好教育经费和提高教学与教育质量而斗争。

高师向综合看齐的理由是科学教学内容赶上世界科技发展。其实，能否赶上不在增加新教材，而主要在于更新教材及用少、精、活的方法培养学生对新知的兴趣及学习能力(自学能力)及创新能力。

——张敦荣

西南大学记忆

2009年第3期(总第4期)

主办:

档案馆
西南大学 校史研究室

顾问:张跃光 丁忠民

李兰 徐仲林

刊名题字:袁隆平

主编:潘洵

执行主编:蒋涛

副主编:胡小京

执行编辑:李亚勃

编委:(按姓氏排序)

郝龙 洪秋冰 何宝芝

刘广生 刘沐璠 李金芳

田朋朋 王娜

美编:李杏怡

校训:



目

刊首语 张敷荣

工作动态

4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档案事业

更好地科学发展并为科学发展服务

——在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上的讲话(下) 杨冬权

名师风采

10 对我影响至深的几件事 张敷荣

13 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回忆恩师张敷荣先生对我的培养与教育 张武升

16 先生风范 学子楷模

——试谈张敷荣先生的人生观 刘义兵

21 我的父亲侯光炯(下) 侯啸喆

28 情系大地

——忆侯光炯教授二、三事 龙再忠

档案拾遗

34 校档中的张敷荣

录

封二、封三

38 刘尊一自传(上) 刘尊一

校友天地

43 密林竹海中的深情寄托
——记大熊猫研究专家胡锦矗教授 邓 力

校史校情

47 西南大学寻根(之三)
——四川省立教育学院 胡小京

52 兰华芳菲 魅力永驻
——记郑兰华教授 刘迪志 周光明 曾国蓉

54 求真 求实 揭校史谜团 李 兰

蒹葭之声

56 西大学子参观校史展览馆感言

他山之石

59 丽娃河畔的历史记忆
——记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 洪秋冰

Memory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让我们共同书写记忆,为
西南大学创造希望与奇迹!

本刊地址:重庆·北碚

西南大学档案馆、校史研究室

联系电话:023-68252544

13436113550

校史馆参观预约电话:

023-68252544

投稿邮箱 xdjy2009@126.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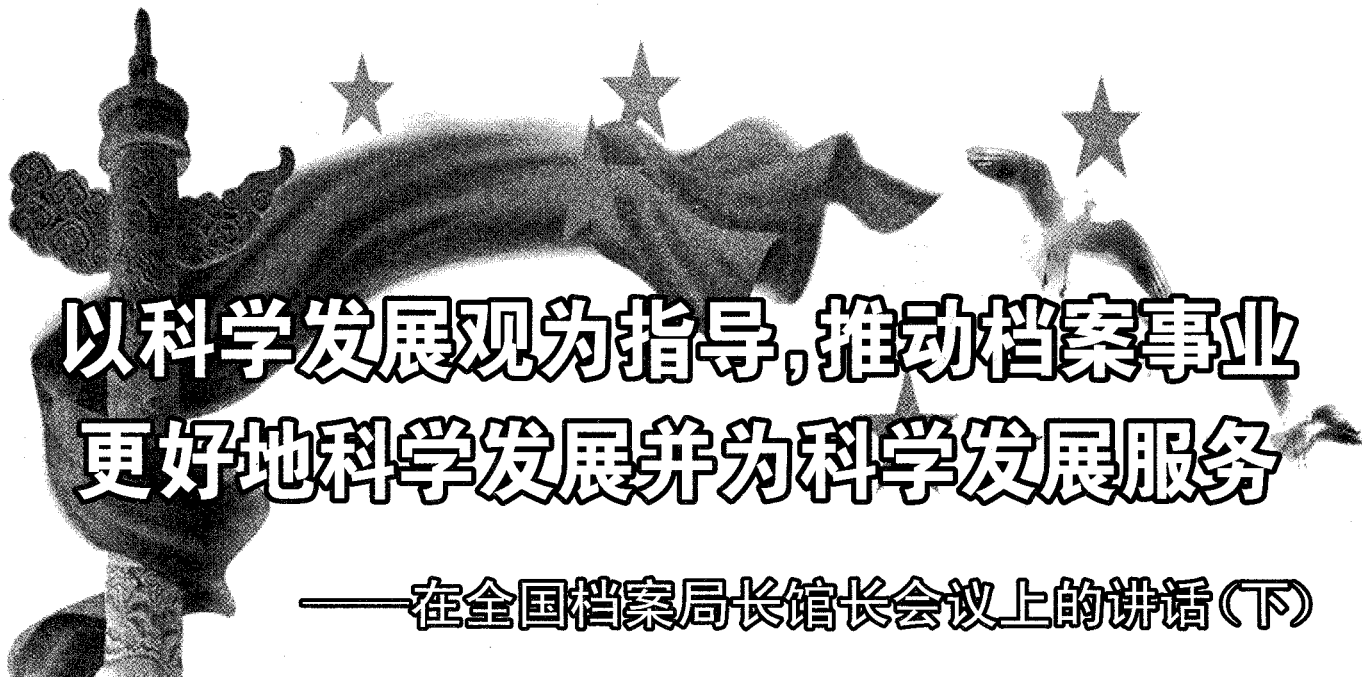
邮编:400715

照排:海华技术服务部

记忆:

历史之基

智慧之源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档案事业 更好地科学发展并为科学发展服务

——在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上的讲话(下)

(2008年12月19日)

□文 / 杨冬权

二、2009年全国档案工作的主要任务

2009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一年,是全党继续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一年。2009年全国档案工作的总体要求是: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好档案工作,加快推进“两个体系”建设,促进档案工作更好地为科学发展服务,同时加快实现档案事业自身的科学发展。

(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胡锦涛同志指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更好地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的需要。从档案部门来说,科学发展需要档案工作,档案事业自身也需要科学发展,因此,我们不仅要按中央的部署,继续分期分批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而且必须深入持久地在档案工作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1. 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各级档案部门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以“重新认识档案工作”为主要内容的解放思想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切实转变档案工作中

那些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思想观念,自己不敢想、不敢试、不敢干的,要允许别人想、别人试、别人干,把各级档案部门和广大档案工作者的创造性、积极性都充分调动起来。要把坚持以人为本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任务,树立“人的档案最重要”的新观念、新认识,以此统率档案部门的各项工作,进而在理论方面不断有所突破,在实践方面不断有所发展,使档案工作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2. 找准问题,明确思路。各级档案部门要深入调查研究,摸清现状,把档案工作中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主要问题找准找对。要重点分析研究在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方面存在哪些问题,在更新理念、创新思路方面存在哪些问题,在增强服务意识、提升服务层次、改进服务手段、优化服务实效、提高服务质量方面存在哪些问题,在科学规划档案事业、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方面存在哪些问题,在合理摆布各项业务工作、确保各项保障措施落实到位方面存在哪些问题,在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调动干部积极性方面存在哪些问题等

等,并在更高起点上提出改进工作的总体思路和具体措施。

3. 增强素质,提高水平。科学发展的根本出路是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各级档案部门要着力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领,造就有能力推动档案工作科学发展的领导集体,引导广大干部不断提高运用科学发展观分析和解决档案工作实际问题的能力,努力建设一支眼界宽、思路宽、创造力强、工作能力强的高素质档案干部队伍,为推动科学发展提供坚强的人才保证。

(二)围绕中心工作开展档案服务

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是档案工作的根本任务。各级档案部门要牢牢抓住这个根本,自觉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安排好各自的工作。

1. 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服务。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针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影响,对2009年的全国经济工作提出了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我们要贯彻会议精神,努力做好相关档案工作。要围绕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大力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进一步做好科技档案工作;围绕全面加强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和资源综合利用工作,建好并用好与之相关的专业档案;围绕各级政府为扩大内需而出台的基本建设项目,切实做好重大建设项目档案工作;围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和广大中小企业的发展活力和竞争力、实施“走出去”战略等任务,加强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驻境外企业档案工作的指导和帮助;围绕着力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切实维护社会稳定,进一步建好用好各类民生档案;围绕切实抓好食品药品质量和生产安全,建好食品检测、药品检测、安全生产等方面档案,为建立权责利相对应的法律追究惩治体系服务;围绕提高金融监管能力,进一步加强金融系统的档案工作;围绕从源头上预防矛盾纠纷的发生,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切实把各类档案建好用好。国家档案局将于明年与国资委联合召开中央企业档案工作会议,并会同国资委共同调研修改《国有企业资产与产权变动档案处置办法》,进行《企业档案工作规范》宣贯工作;继续开展重点建设项目档案工作巡回检查。

2. 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做好农业

农村档案工作,为农村改革发展服务。“三农”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全局。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了贯彻全会精神,我们召开了全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现场会,提出了新阶段农业农村档案工作的新目标、新任务、新要求。各级档案部门的主要领导要积极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切实重视并持续不懈地抓好农业农村档案工作,重心下沉,面向农村,认真统筹城乡档案工作协调发展,把工作着力点和政策与资源的支持点都向农村倾斜,推进建立覆盖新农村建设各个方面和全体农民的农村档案工作体系。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涉及诸多方面,档案部门要努力争取将其列入本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并积极联合各涉农部门和相关部门,建立和完善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的协调机制,借助各方面力量,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加快推进农业农村档案工作上台阶、上水平。

农业农村档案工作要着重抓好三项工作:一是抓紧在两年内尽快完成农村各立档单位文件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与完善工作;二是为农村各种新型社会组织 and 新的工作领域建立档案,特别是土地流转和农产品种植、检测、加工等方面的档案,事关农民的根本利益和社会稳定大局,更要严密建好和管好;三是要充分利用农村现有各种信息网络,上载档案信息,让农民不出村庄就可以方便地利用档案。2009年国家档案局准备做三件事来促进农业农村档案工作,第一件事是我本人要把湖北宜都市作为农业农村档案工作联系点,重点抓上列三项工作。希望各省、地、县三级档案局的主要负责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也每人确定一个农业农村档案工作联系点,联系点可以是县,也可以是乡镇或村,同样重点做好上列三项工作。第二件事是争取与有关涉农部门共同启动“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示范县”评选试点工作,希望各地争创示范县,用示范县来带动其他农村地区的档案工作。第三件事是启动和推进实施“农村档案资源共享工程”,目的是让农民能便利地利用档案。实现农村档案资源共享,可以有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是利用其他部门已经构建的农村公共信息平台,上载或提供档案信息。例如:可以把公开政务信息和已公开档案数字化,上载到“农村党员远程教育”等网络平台上;可以通过本地电视台滚动播放字幕等方式,把公开政务信息和已公开档案信息传送给广大农民;可以把农民需

要的已公开档案、信息汇编成册,送到乡村档案室和乡镇文化站、农家书屋等农村文化场所。第二种办法是争取领导和有关部门支持,为档案系统专门建设农村档案资源共享平台。这种办法需要的投入比较多,但有条件的省或地、县经过争取也是可以做到的。我局也打算下一步向有关部门争取这方面的投入。希望各级档案部门不等不靠,各显神通,各自争取。特别是第一种办法投入不需很多,只要档案部门加以努力就能做到。各级档案部门要主动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积极采用适合本地区实际的可行办法,推动早日实现农村档案资源的共享。

3. 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等重大活动,开展各种档案宣传和服务。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是 2009 年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活动。各级档案部门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当地党委、政府开展的重点宣传活动,主动提供档案服务;另一方面要发挥自身优势,立足档案特色,利用报刊、出版物、电视文献片、展览、网络、讲座、主题活动等多种形式,积极宣传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和成功经验。我们将从明年 1 月 1 日起,在国家档案局网站连续推出系列专题视频“共和国脚步——1949 年档案”,一周一个专题,全年共 52 个专题,每个专题围绕一个重大事件,综合运用文件、照片、录音、录像等各类档案,制作成多媒体视频;将同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电视文献片《毛泽东在 1949》;将编辑出版《新中国 60 年珍贵档案》等系列丛书和《共和国足迹》录音专辑;将积极参加中央有关单位组织的重大宣传纪念活动。希望各级档案部门尽早规划和筹划,精心组织好庆祝建国 60 周年以及其他重大庆祝纪念活动的宣传和服务工作,掀起爱国主义教育的新高潮。

要以庆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档案馆中小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示范基地试点工作。基地建设要针对未成年人的接受能力和特点,增强参与性、互动性,增强吸引力,更有效地服务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在面向社会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也要加大对档案工作尤其是档案利用效果的宣传。国家档案局将从明年开始,每年主动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宣传档案的利用效果和产生的社会效益。每年 10 月底之前,各省级档案局要向国家档案局和本地区领导报送

当年本地区 10—15 个典型利用事例,各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档案部门要向国家档案局和本单位领导报送 1—2 个典型利用事例,国家档案局将把这些利用事例汇编出版,并向媒体发布,以此来扩大对档案作用的宣传,提高社会的档案意识。

(三)推动“两个体系”建设

建立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和方便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是以人为本思想对档案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是科学发展的形势给档案工作提出的新任务,是对我国档案工作实践新趋势的新总结,也是对以往档案工作体系薄弱方面的新加强。各级档案部门要把建设“两个体系”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抓手,全方位推进,特别是下大力深化、细化,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抓实。

1. 抓紧修订和制定有关法规规章。2009 年要加快推进相关法规规章的修订和制定工作。一是要继续开展《档案法》修改工作。二是要继续落实国家档案局 8 号令。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都要加强督促各立档单位在一两年内完成文件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修改工作,并对其进行认真审查,确保把涉及普通人、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反映该单位基本职能的文件材料列入归档范围,并延长其保管期限。这是建设“两个体系”的基础和条件,这项工作做不好,大量涉及普通群众合法权益的各种文件材料就会被排斥在归档范围之外,无法纳入档案资源体系。三是要尽快修改各级各类档案馆的进馆范围。仅把涉及普通群众合法权益的各种文件材料纳入归档范围是不够的,还必须将其纳入进馆范围,使其成为各级各类档案馆馆藏的组成部分,才能真正建立起永久性的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各级各类档案馆为人民群众服务才能成为现实。因此,各级各类档案馆都要抓紧修改各自的接收档案范围,实现与有关立档单位归档范围的有效衔接,切实做到把涉及到人的档案、把有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档案完整齐全地接收进馆。四是要在符合国家档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加紧修改有关档案利用的规定,注意保障普通群众利用档案的权利,尽量为人民群众利用可以利用的档案提供方便。同时,要对档案工作规章体系进行梳理,凡是不符合以人为本思想,不利于“两个体系”建设的内容,都要抓紧进行修改。

2. 重视已有档案中民生档案资源的整合与开发。

在过去已形成的档案中,含有大量的民生信息,与改善民生、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息息相关。如户籍档案、婚姻档案、干部职工人事档案、人口普查档案、知青档案、军转人员档案、土地承包档案、林权档案、移民档案、土地征用拆迁档案、房地产档案、就业档案、医疗档案、保险档案、计划生育档案、学籍档案等等。由于种种原因,在一些地方,这些档案处于保管比较分散,检索不甚便捷,人民群众不知到哪儿利用、如何利用的状态。有关档案部门要赶紧摸清家底,优先整理,优先数字化,对这些档案资源进行科学整合,大力开发利用,构建并完善民生档案服务平台,为人民群众提供实实在在的方便。

3. 及时建立新形成的民生档案。随着小康社会建设向前推进,各地区、各部门在改善民生方面不断出台新的政策、开展新的工作,随之形成了多种类型的民生档案。各级档案部门对此要密切关注、跟踪服务,及时把各种新形成的与人民群众有关的档案列入归档范围、进馆范围,纳入档案资源体系。例如,对近年新形成的新型合作医疗档案、就业培训档案、居民健康档案、民情档案、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档案、新型服务性组织档案、新型劳资关系档案、产品质量档案、社会保障档案、土地流转档案、民营企业档案等,我们都应该及时跟踪,指导建档。2009年,国家档案局将会同有关部门,推动制定社会救助、社会组织、社会保险、劳动保障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专业档案的管理办法,并对《关于加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档案工作的意见》、《污染源普查档案管理办法》等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各地档案部门也要积极采取措施,加大对涉及民生的专业档案的监管力度,切实把民生档案建好、管好、用好。

4. 加强基层档案工作。基层单位形成的档案,与广大人民群众紧密相关,广大人民群众更多的是需要利用这些单位的档案,因此,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必须下大力气,加强基层单位的档案工作,把基层档案工作夯实。做好基层单位的档案工作,要抓住以下三个重点:一要把档案工作的网络延伸到所有立档单位,确保所有档案形成单位应建尽建,并要求各单位明确承担档案工作的专兼职机构或人员,明确本单位档案工作的职责。二要把各单位的归档范围覆盖到所有应归档的文件材料,指导并督促各单位制定好本单位的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确保所有涉民档案应归尽归。三要把各单位的档案保管好、利用好,督促并帮助他们搞好各

项基础业务建设,做到整理科学、保管安全、检索准确、利用方便。

5. 开展家庭建档服务。为有建档需要和建档条件的家庭提供建档指导,是近年来档案部门拓展服务领域、造福人民群众的一项新工作,同时也是推进“两个体系”建设的重要落脚点之一。普及和推广家庭建档,促进了社会文明和进步,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各级档案部门应从本地区实际出发,争取工、青、妇、民政、教育、精神文明建设等部门的支持,发挥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学校等基层组织和基层单位的作用,积极推进家庭建档,使这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成为广大百姓的自觉自愿,把档案工作进千家万户作为对于“两个体系”建设的重要补充,把档案服务工作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6. 创新利用服务方式和手段。近年来,各级档案部门紧密跟踪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及时了解人民群众对档案的查阅需求,增强了提供利用服务的主动性,创造了许多新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下一步,我们要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包括借助其他部门在社区和农村已经建成的各种网络平台,上载档案内容,或发布利用指南,帮助人民群众了解与己有关档案的可查阅范围、查阅方法、查阅地点及时间等,加快建立和完善方便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为人民群众利用档案提供更多的方便。

(四)促进档案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是档案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统筹安排各环节工作,正确处理好各方面关系,才能保证档案事业发展的整体性、均衡性、连续性。

1. 加大档案行政执法检查和专项督查的力度。2009年国家档案局将继续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各省开展档案执法检查 and 专项督查。希望各级档案部门也相应地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督查。发现违法案件的要坚决查处,发现重大安全隐患的要向被检查单位下发限期整改意见通知单,发现其他问题的要向被检查单位领导通报。

2. 继续开展档案事业发展综合评估,并配合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开展市县级国家综合档案馆测评工作。相关单位要积极准备,创造条件,以评估和测评为动力,整体提高工作水平。

3. 加强档案馆库建设。2009年,国家档案局将召开全国档案馆工作会议,推动建设集多种功能于一体、

符合《档案馆建设标准》的新型档案馆;将争取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实施中西部地区县级国家综合档案馆建设补助项目。档案是公共凭证,档案馆、室是公共凭证的保管和利用中心,为社会提供公共凭证服务,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要积极争取本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支持,把档案馆库建设列入政府财政支持范围或基本建设规划,促进本地区的档案馆库建设;各级机关档案部门也要争取本单位领导支持,改善档案库房条件。

4. 加强档案整理和数字化工作。今后,各级档案馆、室基础业务工作的基本路径就是:实施数字化带动战略,逐页对档案进行整理,并对内容、数量、附录等进行著录,然后通过数字化等方法进行复制,以复制件提供利用,把原件封存。这样既可确保档案安全,又可方便档案利用。各级档案馆、室都要进一步加强对传统载体档案的整理和数字化工作,以数字化带动整理工作,方便利用工作,保证档案安全。

5. 加强电子文件管理。2009年,《电子文件管理办法》将由有关部门发布,各级档案部门要按照《办法》赋予的职责,联合有关部门,加强对电子文件的管理。各单位档案室,要加强电子文件的归档收集工作,确保应归尽归。各级档案馆要积极建立电子文件中心,对电子文件及时进行备份和转换,并实施有效的管理与利用。

6. 继续做好政务公开信息和开放档案提供利用工作。各级国家档案馆要在总结已有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政府信息公开提供利用工作。同时,按照档案开放有关规定和政府信息公开的原则,进一步扩大档案开放的范围,对已满30年的应开放档案和未满30年的可开放档案,经鉴定划分后积极向社会开放。各级档案室也可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的原则,积极进行把本单位档案中的公开信息向社会提供利用的试验。

7. 推动区域间档案工作均衡发展。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档案工作发展也不均衡,我们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统筹全局、兼顾各方,把各地区各领域的档案工作统筹好、协调好,把档案工作各环节各方面统筹好、协调好,促进全国档案事业均衡发展。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要有针对性地加大对后进单位档案工作的指导与监督,同时引导不同区域档案部门间加强交流与合作,开展对口交流和对口支援,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一要在档案业务建

设方面开展交流与合作,互派档案干部进行业务考察和工作交流,让大家在学习对方经验的基础上拓展自己的工作思路。二要在档案干部培训方面开展交流与合作,把档案干部培训作为对口交流、对口支援的重要内容,为有需求的地区培养更多具有较高素质的专业人员。三要在档案工作物质条件方面开展交流与合作,目前在一些欠发达地区,档案馆舍条件较差,设施设备陈旧,发达地区档案部门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急需帮助的欠发达地区档案部门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们创造开展工作的必要条件,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8. 更多地争取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档案工作存在于各行各业,服务于各行各业,档案部门既要努力有所作为,也需要方方面面的支持。俗话说,“君子善假于物”。档案部门开展工作,必须善于借力。档案部门的有些活动,可以同有关部门共同举办,并争取请领导参加;有些文件,可以同有关部门联合下发,或请领导部门转发;档案部门的领导,要善于同分管领导及有关部门的领导进行沟通,多做些宣传、说服、争取工作。要善于找题目、出点子、想办法,寻求更多政策和资金支持。特别是其他部门已经搭建好的平台,档案部门要善于利用,借船出海,拓展工作出路。总之,各级档案部门的主要领导,要拿出主要精力来加强这项工作,为事业发展营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五)确保档案安全

当前,档案安全的内外形势都不容乐观。从外部形势看,突发的自然灾害和社会事件都给档案造成损毁。从内部形势看,一些档案部门内部管理混乱,也对档案安全造成了危害。这些现实的档案安全威胁,为我们敲响了警钟。确保档案安全万无一失,是档案部门的基本职责。各级档案部门和全体档案工作者都要从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高度,深刻认识档案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切实履行党和国家赋予的责任。

1. 加强内部管理。今年,我局组织了6个督查组到6个省级档案馆进行档案安全专项督查,发现各馆不同程度地存在安全漏洞:有的库房内没有监控设施或自动报警和相应灭火设施,有的利用场所未安装监控设施;有的档案虽然已经缩微或数字化,但仍在提供原件使用;有的档案交接只清点到卷而未清点到页;有的内部人员借用档案不及时归还;有的档案目录对档案页数和附件著录不全,易给偷窃者以可乘之机。这说

明,我们的管理还不够严密,还有漏洞,还不足以确保档案的安全。当前,各级档案馆、室都要全面进行一次档案安全专项检查,看各项规章制度是否健全,是否得到严格执行;看各个工作环节、各个工作部位是否存在安全漏洞和安全隐患,能否确保档案安全;看各种安全设施是否健全,能否真正发挥作用等等。今后,各单位每年都要进行一两次档案安全检查,每次检查都要有记录、有整改措施等,从而不断健全强化内部管理,严密堵塞各种安全漏洞。凡发生档案安全事故的,一定要严肃追究责任人和相关领导的责任。2009年,国家档案局将出台有关档案安全事故责任追究的规定。

2. 实施重要档案异地备份制度。俗话说,鸡蛋不能只放在一个篮子里。我国从古到今,都对重要档案实行多套异地备份。特别在上世纪60年代,许多档案馆都为备战而建立了后库。但近二三十年随着战争危险的减弱,很多档案馆的后库都弃置不用了。在危害档案安全的突发社会事件和自然灾害频发的今天,我们必须强化风险防范意识,提高灾害应对能力,采用新的手段,重新实施重要档案异地备份制度,在不同的地方存放重要档案的重份或缩微、复印、数字化等形式的副本。省以上档案馆凡有后库的都应恢复使用,存放档案副本;没有后库的,应与其他省档案馆互在本馆为对方建立备份档案库房,互为对方存放备份档案选择异地备份场所,以相距300公里以上,不属同一江河流域、同一电网、同一地震带的地方为宜。除了要求省级档案馆这样做以外,提倡地级、县级档案馆也这样做,对重要档案实行异地备份。特别是安全系数较低的电子文件,一定要普遍实行异地备份。有条件的地方,还应逐步将电子文件转换成其他载体保存,实行异质备份,以防止若干年后电子文件因阅读设备不配套而无法读取。今后,要把重要档案异地备份作为确保档案安全的一项制度来实施。各级档案部门要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共同推动这项制度的实施。

3. 采取其他防范措施。特别在档案建筑上,一定要采取防震、防火措施。档案建筑的抗震烈度一定要高于当地的普通公共建筑,档案库房应尽量采用防火阻燃材料,并安装自动报警和相应灭火装置,或采取其他防火措施。档案装具也要考虑应急情况,应把重要的档案放在封闭便携式档案柜中。因为多次灾害告诉我们:抗震性能好的库房,能避免档案因库房震垮而遭受毁灭性损

失;使用防火阻燃材料的库房,档案不至于在火灾发生时被烧毁;封闭便携式档案柜在各种灾害来临或紧急情况发生时,都对保护和抢救档案有利。对此,我们要形成共识,引起重视,切实采取以上这些行之有效的防范措施来确保档案安全。

4. 对已有复制件的档案原件进行封存。我到西方一些国家的档案馆,看到他们把已经数字化了的档案原件,装进无酸纸盒中,加以密封保存,这样对原件可以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从今年开始,中央档案馆和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也开始对已有复制件的档案进行临时封存。各级档案馆都要把对已有复制件的档案原件进行封存作为确保档案安全的一项制度来执行。凡是已有缩微、复印、数字化等形式副本的档案原件一律封存,无特殊情况的,都不再提供利用,而以复制件提供利用。

5. 制定应急预案。各级档案馆、室都要制定应急预案,对所能设想到的各种突发灾害、突发社会事件到来时怎样抢救、保护档案制定出方案,以便紧急情况发生时按预案办事。每年要按预案进行演练。当紧急情况发生时,档案部门的领导人一定要冷静清醒,果断沉着,自身能处置的紧急处置,自身处置不了的要立即边报告有关部门请求协助,边采取其他挽救措施,决不能无所作为,优柔寡断,延误时机,甚至临阵脱逃,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凡有这种情况的,一定从严处理。

6. 加强抢救和补救。对突发灾害、事件造成档案损失的,一定要尽快对破损档案采取抢救和保护措施,避免造成更大损失。还可采取到有关单位复制和征集等办法,用复制件等填补已损毁档案造成的空白,降低损失程度。各级国家档案馆要继续做好国家重点档案抢救和保护工作,把国家补助的专项经费切实利用好,严禁挪作他用。明年,国家档案局将会同财政部,对有关地区国家重点档案抢救和保护补助费使用情况进行绩效评估,加强监督和指导。

同志们,我国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任务艰巨而繁重。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档案事业发展全局,锐意进取,扎实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

(责任编辑:王娜)

编者按：张敷荣（1904—1998），贵州普安人，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教学论专家。1921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8年考入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先后获得教育学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建国后曾任西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前身之一）教授、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和研究工作中，他对教育学领域里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教学思想和教育理论体系。

对我影响至深的几件事

□文 / 张敷荣

回忆对我一生影响重大的经历，首先是我幼年的环境与教育。我出生刚八个月，母即病逝，全靠父亲教养。他系清朝末年进士（贡生），未入仕宦，耻与土豪劣绅为伍，甘当月薪8元的小学教员，以教书育人为乐。他知我幼失母爱，体弱多病，体力劳动不如同龄少年，但读书能力较强，在家贫无法供我升学期间，也不要我参加农业劳动，教我专心学习，争取考入公费学校。因此，我14岁时，不怕路途艰险，步行10天，考入贵阳师范学校。不幸，我在二年级下学期因病耽搁2/3学时而留级。为了不辜负父亲的希望和自己的前途，我决心专攻英语，乃能在1921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我父虽于1926年逝世，但他给我“正己方能正人”之道，却初



1918年张敷荣报考省立贵阳初级师范学校时留影

步奠定了我人生的走向。

其次是“五四运动”的影响。1919年，“五四运动”的东风吹到贵阳师范学校。在校长尹笃生的启迪下，我体会到这运动的核心是爱国主义，其基本点是争取民主与发展科学。这拓宽了我生活的视野和学习目标，使我认识到在祖国备受列强欺凌的情况下，个人奋斗的成就再大，社会地位再高，面对世界也仍感耻辱，只有全国人民发愤图强，力雪国耻，个人才能顶天立地，无愧生存。因此，我和一些志趣相近的同学誓行“五不主义”（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不坐人力车、不进茶馆），互相鼓励，努力学习，使自己将来能对祖国的富强和民族素质的提高有所贡献。从此，我感到为国家和民族而学习的动力，远比为个人名誉地位而学习的动力更大而且持久。在清华高中学习期间，功课虽十分繁忙，我也与三位同学创办了清华第一所平民学校，为校园周围的贫苦儿童提供学习机会。在美国留学期间，我在刻苦钻研教育科学理论的同时，还积极研究美国的劳工教育，写成《美国劳工教育运动》的硕士论文。在紧张学习的情况下，我仍每周抽出一天半时间到离斯坦福大学30英里的旧金山南桥学校义务讲授中国史和汉语。在日寇入侵东三省时，我曾两次组织华侨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大大增强了侨胞对祖国的向心力和认同感。过去美国公立学校肆行隔离华裔儿童的政策，使他们不能与白人儿童享受同等质量的教育。这种企图使华裔青少年将来缺乏在美国生存竞争能力的种族主义策略，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竟有两篇博、硕士论文大加赞扬，并胡说它得到华侨的默认甚至欢迎！这令我义愤填膺，决定给予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于是，我毅然选定《美国旧金山公立学校隔离华裔儿童运动的研究》作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题。幸好因为我曾在《旧金山时报》（英文）上发表一篇文章，驳斥日本教授市桥勉在斯坦福大学讲授东方文化史时对中国的污蔑和对历史的歪曲，引起了斯大



1926年张敷荣(后排右二)在清华学校读书时创办清华第一所平民夜校,与平民学校师生合影

领导和教授的注意，在1933年我完成博士课程考试后，任命我负责筹办中文系，所以我有充分的时间查阅和研究美国各州政法文献及1885年以前的各种新闻报道，又从老年华侨处收集了许多第一手资料，最后以二十三点确切的史料，写成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批驳了上述两篇论文的错误论点，经答辩，获得教育博士学位。1936年春，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去函邀我回国助他把川大办成后方大学基地，为抗日战争发生时沿



1929年张敷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读二年级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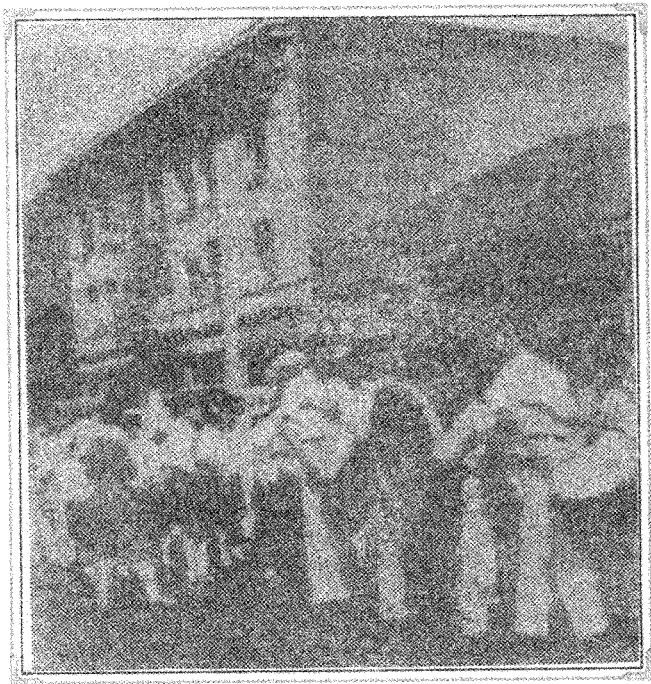
1927年张敷荣在清华学校图书馆查阅文献

海地区大专院校内迁做准备。那时,不仅亲友们劝我不要放弃难得的工作和优裕生活,回到贫穷落后、战乱迭起、多灾多难的中国去,而且斯坦福大学和美国移民局也不允许我回国。但是,一回忆自己过去全靠公费升学和留学,花了大笔祖国同胞的血汗钱,我怎能在祖国需要的时候贪图个人享受,不回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于是我毅然回国,以实现我“教育救国”的梦想。

第三是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问清华学校,在座谈中,我颖悟到:“好人”的定义是“一个能尽力为较多的人做好事的人”。原来家父经常教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从小多病,饱受医药之苦,所以我原来想学医为人治病。在颖悟了“好人”的涵义之后,我决定改学教育,以为搞好教育事业,能为培养更多有医德的医生和其他品德高尚的专家学者打下基础,这是国家走向富强康乐必由之道。这个“好人”的概念的确使我能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在腐朽没落的社会里,能辨别是非、善恶,不致与俗浮沉,随时俯仰;并可以作为有效的教书育人的方法,消除教师与青少年学生之间的“代沟”。更具体地说,根据这个概念,我把世人分为五个档次:第一等是“纯粹利他”(如白求恩、雷锋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第二等是“为我利他”(其中一种是受良心的驱使或求精神上的快慰而利人;另一种是为他人谋利可以获得物质报酬);第三等是“纯粹利己”;第四等是“损人利己”;第五等是“专门

害人”。经过数十年的教育工作实践,我确认这样对人品的评价,对己有利于自我反省和修身养性,提高觉悟;对人更能明辨是非,与人为善或近贤远奸,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对教师的工作,也能克服政治思想教育中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有两位46年前的穷学生、现在的教授曾给我来函致谢说:“我们还清楚地记得在国民党反动政权快要崩溃的岁月里,张老师在每月仅有五斗米薪水的困境下,还拿出两斗米资助我们渡过难关……”。四年前,一位博士生从美国加州大学来信说:“您过去是,现在

是,今后仍然是我的导师。您对我生活道路的选择、思想感情定向方面的影响将使我受用无穷。……您是我学术上的导师,您更是我人格上的导师;您教导我How to conduct research,我向您学怎样做人。”



1931年日寇入侵中国东三省时张敷荣(右一)在美国旧金山组织华侨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抗议。

(责任编辑:刘广生)



张敷荣青年时期

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回忆恩师张敷荣先生对我的培养与教育

□文 / 张武升*

作为张敷荣先生的第一届教学论博士生,我毕业获得学位走上工作岗位已经近六年了。这些年来,我致力于教学论与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主持完成了国家教委级课题一项,天津市市级与院级课题各一项,另外还承担国家级、教委级课题的各一项子课题;发表论文二十篇(共十五万字);出版了《教学艺术论》、《当代中国教学风格论》、《教育改革论》(与人合作)、《中小学创造教育与教学实验探索》(主编论文集)、《帮你创造性地学习》(实验教学用书)等论著(共八十万字)。由于科研成绩突出,我被评为1993年度天津市市级优秀教师、“八·五”立功奖章获得者。

回顾总结自己取得的这些成绩时,我情不自禁地想到我的恩师张敷荣先生。这一切都是他培养教育的结果。现在回忆起给他当学生时的情景,依然格外清晰、亲切,谆谆教诲不绝于耳,循循诱导历历在目。在经历

了若干年生活与事业的锻炼之后,再回思考他老人家的教导,更觉得寓意深刻、倍受启发。

—

我于1985年11月从孔子故乡曲阜赴西师学习,作张先生的博士生。从第一次见面到现在的一切交谈中,张先生给我强调了一个主题,即做学问必先做人。只有学会了做人,才能做好学问。张先生所强调的做人,其内涵很多,有政治觉悟、思想观点方面的内容,更有作为一个学者所具备的基本素质。在政治上,他鼓励我要求进步,主动靠近党组织,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于毕业前的1988年7月1日实现了他的要求,光荣入党);在思想上,他要求我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研究问题;在治学上,他教育我努力做到“三求”,即“求正、求严、求信”。“求正”就是为人处事要公正,正直耿介,不屈邪,不为歧

* 张武升,张敷荣先生的第一届教学论博士,现任天津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1986年张敷荣教授(右一)与博士生张武升(左一)、李慰昌(左二)进行学术讨论时留影

途所迷,不为邪欲所惑,走出一条堂堂正正的人生之路,达到“终生无悔”的境界;“求严”就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大度,宽厚,友善,博爱,能“容人”,方能容百家之言,集百科知识,达到博大精深的境界;“求信”就是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有坚定的信仰,有崇高的威信,达到可信可靠的境界。这“三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正”是基础,“严”是保证,“信”是目标。这些政治的、思想的和治学的要求,是张先生育人的经验,给我经常讲,反复讲,要求我不断反省自身,检查是否做到。这些已成为我的座右铭。

张先生这样教导我,他自己更做出榜样。在与他相处的日子里,我亲眼目睹他与现实中的一些不良现象作无情的斗争。对于那些趋炎附势的“势力”人,他从来不屑一顾。他把自己一生积攒的数万元钱捐献给他的家乡,用于兴办学校,改善教育条件。而他自己却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家里没有现代化的家具,也没有豪华的摆设。对于这些我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是一种无声的教育。

正是受先生的这种教育,我及后来的几位博士生在拜金主义思想泛滥的情况下,都坚守教育科研的信条和阵地,努力耕耘,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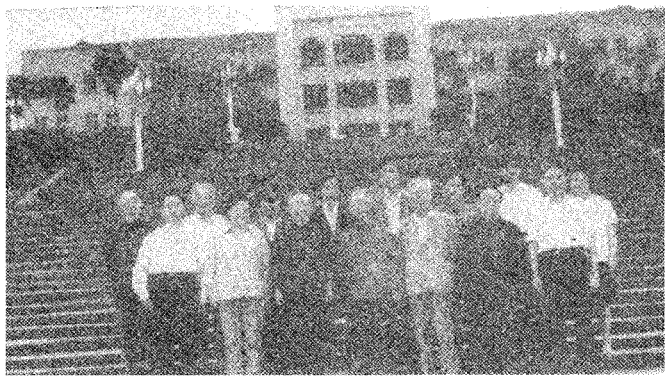
二

作为学生,无论是读硕士,还是读博士,都要做学问。做学问有其自身之道。导师就是引学生“入道”,最后再“出道”。“入道”是第一步,是第一境界,而“出道”,则是更高一步,是更高的境界。“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才是成功。用张先生的话来说,“入道”就是掌握做

学问的方法,学会获得学问;“出道”就是在掌握别人学问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治学风格,产生出自己独创的新学问。作为博士生,必须做到这两步,达到这两个境界。

基于上述认识,张先生对我要求极严。他经常谈到他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作博士学位论文时的经验。他在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以实证的态度和方法,查阅所有能查到的资料,来证明华人在美国教育中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而华人又做出了那样大的贡献。所以,他要求我也要把思想理论观点与实证方法结合起来。他针对我读硕士生时的知识结构情况,让我补习教育测量学、测验学、统计学及计算机方面的知识,并指导我把博士论文的研究与写作定在理论研究与实验研究相结合的原则之上。正是他的这种要求和指导,才使我走出书斋,选择一所实验学校,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实验,写出了一篇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博士学位论文,获得全国三十位专家的好评。而这一经验对我的效用还不止于此,他影响我在走上科研工作岗位之后,仍然把理论分析与实验研究相结合,并成为十几所教改实验校的具体指导者。

张先生非常重视用新学科、交叉学科、综合学科知识来武装学生。我当博士生时学的第一门课就是“现代系统论与教育教学研究”,分别由著名理论学家查有梁教授和康继鼎教授主讲。查先生讲“‘三论’与教育科学”,康先生讲“教育系统工程与教育科研”。这两讲都是运用现代新兴学科来研究教育问题,在当时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张先生亲临讲课现场,对这门课作了一段精辟的发言,其中的意思是:要开门办学,开放式地培养博士生。一是要知识开放,学教学论的不能就教学论来论教学论,要善于运用相关的新兴学科从多维度多视角地研



1988年张敷荣教授(前排右三)同张武升博士(后排右四)论文答辩委员及部分领导留影

究教学论。只有这样,才能使学习和研究的思路打得开,发掘得深。二是要开门培养,善于请相关学科的专家来给博士生讲课,传授知识和做学问的方法。这样不仅能避免“近亲繁殖”,而且有助于开辟百家争鸣的学术新风。现代的博士生,尤其是教学论的博士生,要学会运用“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理论和方法,来思考和探讨教学问题,因为教学作为师生的双边活动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高级系统,不用系统论方法,是难以研究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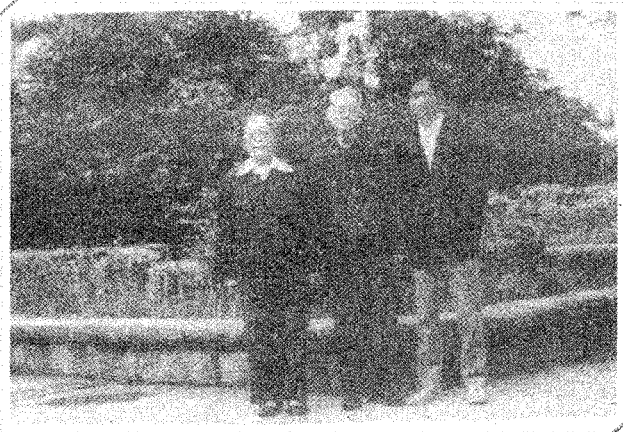
当时张先生的这一席话获得了在场专家们的一致赞同。大家认为,张先生虽然已是高龄,是教学论学术界的老专家,但思维开阔,观点新颖,仍然走在教学论发展的前沿,并能用“超前的”眼光来重视和培养后继人才,这对于中青年学者是十分宝贵的榜样。

在对博士生的培养中,张先生十分重视课程的层次。有的学校在课程安排上博士生与硕士生区别不大,难以看出水平上的不同。对此,张先生深表忧虑,因为他认为这是一种浪费。博士生必须有适合其特点的课程。他的一个改革就是把博士生的专业课程开设成专题学生讲座。就是说,不去重复讲某门学科,而是把这门学科划分出若干的专题,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地开设学术讲座,将这一专题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一脉串起来,并进行比较分析,从中找出演变、革新的规律。这样,学生不仅系统掌握了专题知识,而且掌握了分析问题、研究问题和把握规律的方法。例如,关于“中国教学思想史”这门课程,他与何志汉先生共同商量,开设专题学术讲座。把中国教学思想史划分出若干专题,分别进行学术讲座,而且不仅先生讲,学生也要讲。我记得当时我分担了两个专题《教学过程论》和《教学原则论》,就这两讲的内容我写出了四万字的讲稿给何先生讲。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东西,也锻炼了能力。而何志汉先生的各讲则更精彩,资料丰富,而且古往今来,一以贯之,给人深刻的启发。这一教学形式是适合于博士生的特点的。

在培养过程中,张先生不仅重视博士生的知识、能力等智力因素,而且还重视学习态度、勤奋、认真等非智力因素。他经常用这样一个例子来教育我。他说,美国教育思想家克伯屈曾提出“副学习”的理论,并举一个学裁缝的例子。聪明的学徒工不仅学习师傅的精湛的手

艺,而且学习师傅的认真工作态度和对顾客的热情、耐心、周到。后者被称为“副学习”,常常是潜移默化的,但它一点也不亚于知识、能力的学习。张先生用此来教育我要认真、认真、再认真。做事要追求精益求精,不要轻易满足自己。这些教育正是针对了我的学习弱点。我学习与研究,在思维的灵活、快速上一般来说还可以,但在严谨、周密方面却相比之下显得薄弱,这就需要通过发展非智力因素来弥补。

正是由于张先生的全面而细致的培养,使我打下了较好的教学论研究基础,在某些方面的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绩。例如关于教学模式的研究,我所写的论文《关于教学模式的探讨》(发表于《教育研究》1988年第7期)被学术界公认为是这方面研究开拓较早的成果之一。



1988年张敷荣教授(中)及夫人蔡彰淑女士(左)
同张武升博士(右)合影

我所撰著的《教学艺术论》和《当代中国教学风格论》两本书在国内也具有开拓新学科、新领域的作用。

三

张先生对于我不仅是一位良师,而且还是一位慈父。他就像亲生父亲关心自己的儿女那样关心博士生的生活和身体。他看到我当时身体特别瘦弱,就嘱咐我加强体育锻炼。他还现身说服我。他在青年时期就读于清华大学,由于身体很弱几乎不被录取。为此,他在入学后制定了体育锻炼计划,没下几个月,就收效甚大,最终使身体非常健壮。他认为他80余岁身体依然很好,与当时就坚持下的体育锻炼有关。他用此来教育我,我照做了,果然也奏效。他深知博士生生活的清苦,我当

(下转第20页)

先生风范 学子楷模

——试谈张敷荣先生的人生观

□文 / 刘义兵 *

人生观是人们对人生目的和意义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每个身心正常的人都有自己对人生目的和意义的看法。然而,由于各人所处的时代的不同、代表的阶级不同以及遭受的境遇不同,因而人们对人生的看法也大不相同。张先生对人生的意义的理解与实践,也正是基于他所处的生活环境和亲身感受。回顾张先生半个多世纪以来执教杏坛,孜孜以求,辛勤耕耘,即便在九十高龄之际,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从未对“教书匠”职业有过丝毫倦怠。人们不禁会问,这其中的原动力是什么?的确,张先生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去研究,值得我们继承学习。尤其是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现实生活各个层面、各个角落的今天,我们更应该从张先生身上悟出人生的哲理,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而富有意义。

张先生常告诫青年学子,人生犹如汪洋大海中的一条船,此船能否沿着既定目标顺利到达彼岸,全靠舵手对正确航向的辨别力和与风浪搏斗的勇气和能力。张先生认为,社会中每个人虽然职业不同,但都应该有坚定不移的、正确的人生观。只有这样,社会才会不断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教师作为青少年儿童的良师益

友、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更应该有意识地树立起自己正确的人生观,潜移默化,循循善诱,身体力行地去影响、引导青少年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张先生认为,这是作为取得合格教师的必修课。

先生曾说:“回忆对我一身影响重大的经历,首先是我幼年的环境与教育。其次是‘五四运动’的影响。再次是1924年的印度诗人泰戈尔访问清华学校使我领悟到‘好人’的定义。”先生出生刚8个月,母即病逝,从小失去母爱,全靠父亲教养。先生的父亲系清朝末年贡生,耻与土豪劣绅为伍而在乡村设馆授徒。先生的父亲虽然子女众多,生计为艰,但深明学业重要,鼓励先生发奋学习。先生自知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遂立志攻书以图扬名显亲,于是先生在14岁时便考入贵阳初级师范学校。先生后来回忆道:“我父虽于1926年逝世,但他给我‘正己方能正人’之道,却初步奠定了我的人生走向。”1919年“五·四”运动的春风吹到先生当时就读的贵阳师范学校。在校长尹笃生启迪下,他体会到这场运动的核心是爱国主义,并拓宽了他的生活视野和学习目标,使他认识到在祖国备受欺凌的情况下,个人奋斗的成就再大,社会地位再高,面对世界仍感耻辱;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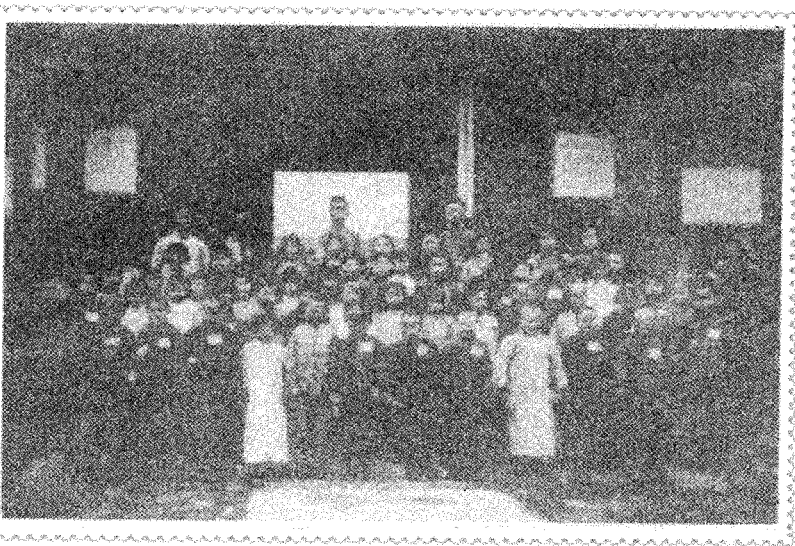
* 刘义兵,西南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培训学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有全国人民发愤图强,力雪国耻,个人才能顶天立地,无愧生存。他曾联合一些志趣相近的同学誓行“五不主义”(即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不坐人力车、不进茶馆)。此时,先生已深切感到为国家和民族而学习的动力,远比为个人名誉地位而学习的动力更大而且持久。

1921年,张先生考上贵州省公费生到北京清华学校学习。先生告别了黔西南“边荒”的乌蒙山区,来到千年古都北平,实际地感受到华夏大地刚刚吹起的科学、民主新风,眼界更为开阔。尤其是1924年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问清华学校,是先生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尽管岁月悠悠,“逝者如斯夫”,但泰戈尔访问清华的情境,先生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印象深刻:

那天,泰戈尔访问清华,不找大的学生谈,专找我们低年級的。坐在“工”字厅,地上铺地毯,他拿把小椅坐中间,我们坐周围。看他是个外国人,长的大胡子,又是大作家,我们个个怯生生,很拘束。“和你们在一块儿,我年轻多了。”泰戈尔捋捋大胡子,高兴的望着大家,“你们不要看我胡子长,我们是一样的呀,我也想年轻。”在谈话中,泰戈尔突然向我们发问:“你们将来想做好人还是坏人?”大家不禁发笑:“这何必问呢?谁愿意做坏人!”“你们笑,我懂:都是想做好人。”泰戈尔不等大家笑完,把话锋一转又问,“但是呢,要做好人,得知道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他接着问大家:“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呢?”问得每个学生哑然瞪眼,不知道怎么回答。

张先生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泰戈尔是如何巧妙地设问,并让先生及其他同学悟出“一个人能尽你的能力,为更多的人,谋最长久的幸福,这才是好人”的真谛。正是这个“好人”的概念,使张先生在青年时期就逐渐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使张先生在腐朽没落的旧社会里也能辨别是非、善恶,不致与世俗浮沉,出污泥而不染。张先生自幼体弱多病,他原本想通过学习医术来为世人解除病痛。后来在泰戈尔“好人”概念的启迪下,他遂改学教育,以为搞好教育事业,可以为培养更多有医德的医生和其他品德高尚的专家学者打下基础,这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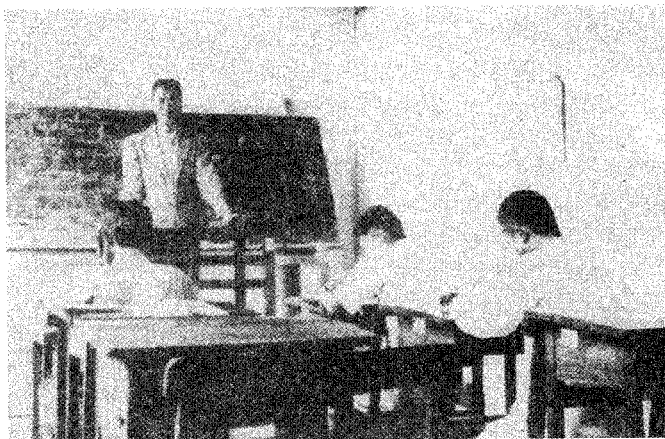


1927年张敷荣(后排右一)与清华平民夜校第二班师生合影

国家走向富强康乐的必由之道。在清华学校学习期间,张先生还深受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献身教育事业的实践所影响。一旦确立了人生目的的走向后,张先生便身体力行,克服各种困难去实现他的伟大抱负。张先生在清华学校学习时,目睹海淀一带许多贫苦儿童失学,感到十分惋惜同情,于是在1926年夏邀约三位同学创办了清华第一所平民学校,利用课余时间义务为贫苦儿童补课。平民学校人数最多时达到200多人。1928年,张先生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戊辰级(1928)考试,同年九月由学校资送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他留学美国期间,面临广泛的专业选择但却只选择了教育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这再次说明他已决定了献身教育事业,为世界上更多的人谋最永久的幸福的伟大理想。

1936年春,张先生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了教育博士学位。此时,日寇侵略中国,先生感到祖国危如垒卵,婉谢了在美国的导师和亲友的竭力挽留,放弃了在美国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毅然回到了战乱频频、多灾多难的祖国,接受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的邀请,协助任鸿隽把川大办成后方大学基地,为抗日战争时沿海地区大专院校内迁作准备。张先生回国后,潜心于教育工作,决心大展宏图,实现自己“教育救国”的人生理想。他不顾辛劳,孜孜不倦地向学生传授现代教育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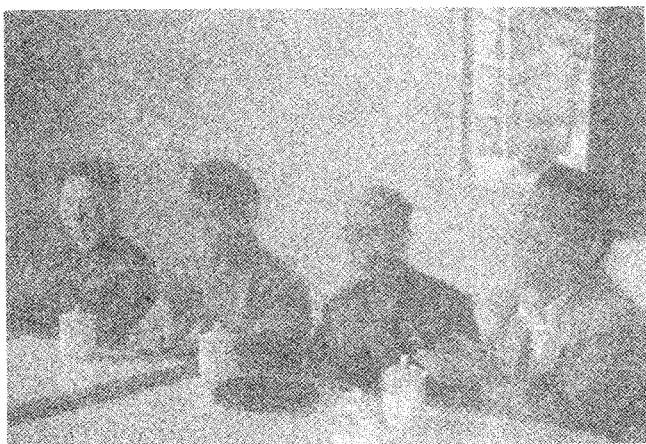
在四川大学执教期间,他先后开出了十一门课程。三十年代末四川大学迁至峨眉山,创办报国小学。1945



1937年张敷荣教授为川大教育系毕业班授课

年,张先生先后接触了一些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在腐朽的政治环境里,“教育救国”只可能是空想。于是,他改变了单纯“教育救国”的理想,把教育实践和革命斗争结合起来,积极支持进步学生的革命活动并参加了“反内战”、“反饥饿”、“反党阀统治学校”等运动。为此,张先生曾险遭反动派的暗害。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旧社会的恶劣环境里苦苦挣扎了近半个世纪的张先生,面对崭新的新中国,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决心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毕生精力。他在四川大学任教育系主任期间,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保质保量完成教学科研任务。他在西南师范学院任教授期间,新开设了三门课程并撰写了近200万字的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在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对教育事业惨遭破坏忧心如焚,仍坚持教育青年学生热爱师范专业、忠诚党的



1989年张敷荣教授(右二)出席西南师范大学学位委员会会议

教育事业。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张先生获得了第二次解放,他更是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为培养高质量的教育硕士和博士,呕心沥血,勤耕不已。他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教学论博士学位授予点;提出了许多有关保证学位质量的建设性建议;提倡集中校际之间的优势力量联合培养博士生的方法;重视博士生课程教材建设。张先生这种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和实践,赢得了许多同行专家的赞誉。东北师大博士生导师王逢贤教授曾给张先生来信说:“您这样的高龄,对教育工作还是这样认真负责,您的老骥伏枥精神,对我确是莫大的鞭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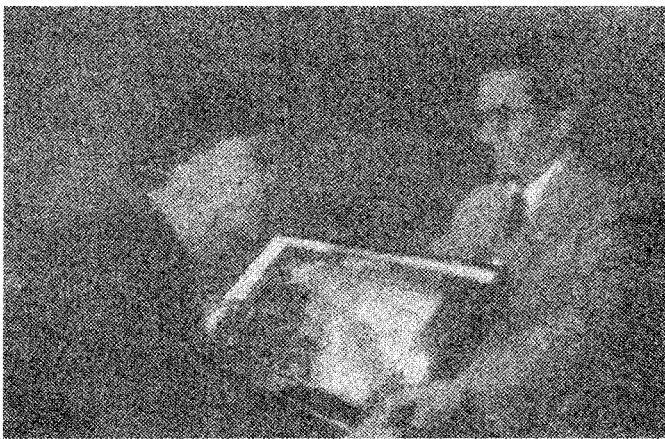
在对待人生态度即怎样做人方面,张先生也有自己的标准。他认为做人应该达到“三求”,即“求正、求严、求信”。“求正”即为人处事要正直耿介,不为歧途所迷,不为邪欲所惑,走出一条正确的人生之路。“求严”即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求信”即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回顾张先生走过的人生道路,他就是按照“三求”要求自己的。譬如在“求正”方面,即使在黑暗的旧社会里,他也做到刚正不阿,坚持真理,维护正义。他刚入斯坦福大学学习时,发现该校风光秀丽的希尔斯威利湖边竟然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时,深感华人受辱并约集全校中国学生向校长提出抗议,迫使该校校长命人将牌子撤走。在日寇入侵东三省时,他曾两次组织华侨学生、学徒示威游行。日本教授市桥勉在斯坦福大学讲授东方文化史时对中国历史肆意歪曲并污蔑中国人,张先生当即在《旧金山时报》上发表文章驳斥。在美国求学期间,张先生发现美国当局高喊民主、平等和自由等口号,标榜学校教育机会均等,但实际上却在公立学校里实行隔离华裔儿童的政策,使华裔儿童不能与白人儿童享受同等质量的教育,斯坦福大学竟然有两篇博士、硕士论文大加赞扬并胡说它得到华侨的默认甚至欢迎!张先生非常气愤,遂以二十三条有力论点写成《1885年以前美国旧金山公立学校隔离华裔儿童运动的研究》的博士论文,批驳了美国教育中的种族主义。1938年末,张先生签名参与由朱光潜等著名学者发起的反对CC系(蒋介石执政时期,由陈果夫、陈立夫领导的一个政治派系。)要员程天放接管四川大学的运动。1948年,张先生以辞职来拒绝参加由反动当局安排的“集训”。

张先生结合自己几十年的实践,曾把世人的品格分为五个档次:第一等是“纯粹利他”(如白求恩、雷锋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第二等是“为我利他(其中一种是受良心的驱使或求精神上的快慰而利人;另一种是为他人谋利可以获得物质报酬);第三等是“纯粹利己”;第四等是“损人利己”;第五等是“专门害人”。张先生确认这样对人品的评价,对己有利于自我反省和修身养性,提高觉悟;对人更能明辨是非,与人为善或近贤远奸,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对教师的工作,也能克服政治思想教育中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对照上述五等人的品格,张先生谦逊地认为自己只做到了“为我利他”,即为得到人们的信赖和自己问心无愧而服务。他认为白求恩、雷锋等千千万万“纯粹利他”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他的楷模。他的立身治学格言是“常有‘八贤’(八贤,陶行知将“何事、何故、何人、何如、何时、何地、何去、几何”称为“八贤”,作为做人行事的“顾问”。)作我师,终身黽勉能‘九思’(九思: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静,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耄耋‘脱毛’(脱毛:十七世纪德国著名化学家李比希认为,如果不像鸟脱毛那样更新自己,就跟不上科学的发展。)功无间,全心全意作‘人梯’”。张先生对立身治学的躬身实践,赢得了青年学生和同行专家们的交口称赞。他的一位博士生从美国加州大学来信说:“您过去是,现在是,今后仍然是我的导师,您对我生活道路的选择、思想感情定向方面的影响将使我受用无穷。……您是我学术上的导师,您更是我人格上的导师;您教导我 How to conduct research, 我向您学怎样做人。”我国著名教学论专家王策三教授给张先生来信说:“通过答辩会的亲身感性实践,对您个人的人格,特别是作为青年导师的风范,有更深切的体会……我从中受到很大的感染和教育。”中央教科所张同善研究员也给予张先生很高的评价:“在渝期间,两次畅谈,受益匪浅。从谈话中更加了解您的人品、学识,实在令人崇敬。回京后,与友人谈及此事,他们也为您的品学所感动。”

张先生常说,作为教育工作者,对于人生价值应该有更深刻更正确的认识。个人的价值体现在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中。他在向中共党组织递交的入党申请书中曾写道:“只有把生命融汇在为人类的解放而斗

争的事业中,才可能得到永生。”这是张先生数十年来实践人生价值的真实写照。

张先生常对学生们说,人生在世,的确很少有人能把名利抛开的,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似乎更多地谈论名与利的问题,这就要求对名与利应该有正确的认识。他们认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我们不可能将权势、名誉地位等置之度外,说它们与自己无关;但是对于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的人民教师,所追求的不应该是虚名或庸俗的权势地位。教育工作者应该追求的是具有社会主义时代特征的“万世师表”之名或地位。在对待金钱方面,张先生更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常说,人究竟是为了吃饭而工作,还是为了工作而吃饭?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搞清楚的最基



1988年张敦荣教授接受钟章成校长颁发奖状

本的问题。他非常赞同教育工作者应该树立“人乃役物,而非役于物”的观念,因而他把更多的时间、更多的金钱和最大的精力,投注在更具价值的培育英才、为社会做奉献方面。正是在这种高尚名利观的驱使下,张先生放弃了在美国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毅然回到贫穷落后的祖国,把自己的才智奉献给祖国人民。在国民党反动政权快要崩溃的岁月里,他在每月只有五斗米薪水的困境下,仍拨出两斗米资助穷苦学生。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重视教育,尊重人才,不断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张先生仍节衣缩食,不时在经济上资助贫困学生。1991年夏,他把自己在成都的私人住宅变卖,再加上他平时的积攒总计三万元人民币,全部捐献给家乡贵州省普安县,用于帮助“那些品学兼优但因为家境贫困而失学的学生”。1992年春,张先生赴昆明治病途中听说云

南边疆地区有不少儿童失学，张先生当即将随身带的200元钱全部捐给“希望工程”用于救助边疆失学儿童。张先生对经济处境差的青年学生常常是解囊相助，慷慨无私，然而他的生活却十分俭朴。他家里摆设的是四十多年前购置的已破旧家具和1936年从美国回来时装满900多本外文教育资料的几口铁皮封隼的老木箱。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还是客厅里的奢侈品。

的确，张先生就是这样为自己考虑得很少，甘为他人、为祖国奉献毕生的品德高尚的人。我国著名教育家顾明远教授曾给予张先生以很高的评价“老师是我国教育界的老前辈，是教育理论的一代宗师……老师的道德文章，使生受教匪浅。”顾先生自称是张先生的学生，这实乃顾先生自谦；然而，他对张先生的评价应该说是中肯的。由于张先生德才学识“仰之弥高”，实非学生我所能全部概括和理解，所以上面记述的仅是张先生人生观的一些实录，其中难免挂一漏万，还希望读者多加指正。



1932年张敷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校园草坪上

（本文选自西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庆祝张敷荣教授从教六十周年暨九十大寿专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1994年5月第1版）

（责任编辑：刘广生）

（上接第15页）

时已成家有了孩子，除了自己生活，还要给孩子和老母亲分别寄生活费，而我当时的助学金只有80元。对此，他非常关心。他委托教科所的尧老师给我找到业余兼课的差事，让我能挣点钱来弥补生活不足。我当时非常感动。这种关心，不仅是一种物质力量，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力量，它催动和激励我更加发奋学习，以此来回报师恩。在这个过程中，值得我特别提及的是我的师母蔡彰淑女士，她辅助张先生培养博士生，在生活上更是对我关心得无微不至。记得我毕业分配离校时，师母考虑到长途旅行会花钱很多，以无可拒绝的感人至深的话语说服我收下她给我的路费。这一幕我终身难忘。可惜的是过了两年我再返回母校时，师母已经病逝，我悲痛万分，泪流满面。现在回想起他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我就格外有力量，有信心，一定要勤奋学习，努力攀登，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恩师，才能告慰九泉之下的师母。

从张老、师母对我的关心中，我悟出了中国“师道”之中的某种宝贵的真谛。他们所做的所反映的不正是

中国教师的传统美德吗？我现在也在兼任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导师，给他们上课，指导他们做学位论文，除此，我也常常主动关心他们的生活，从不同方面帮助他们，我所做的这些，都是从张先生及蔡师母那儿学来的，而且我还要学下去，发扬下去。

四

回忆张先生对我的培养和教育，真是千言万语说不完。我常常一个人独处时想到这些，思考这些，每一次思考，都有一次的收获。张先生不仅学问博大精深，而且在人格上至上完美。想到这些，我就情不自禁地想到《诗经》里的一句话：“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用这句话来描叙张先生，来表达我的感受和认识，再恰当不过了。

（本文选自西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庆祝张敷荣教授从教六十周年暨九十大寿专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1994年5月第1版）

（责任编辑：郝龙）

我的父亲侯光炯

（下）

□文 / 侯啸碚*



侯光炯伏案逐字查阅土壤资料

三、情感的升华

爸爸，我理解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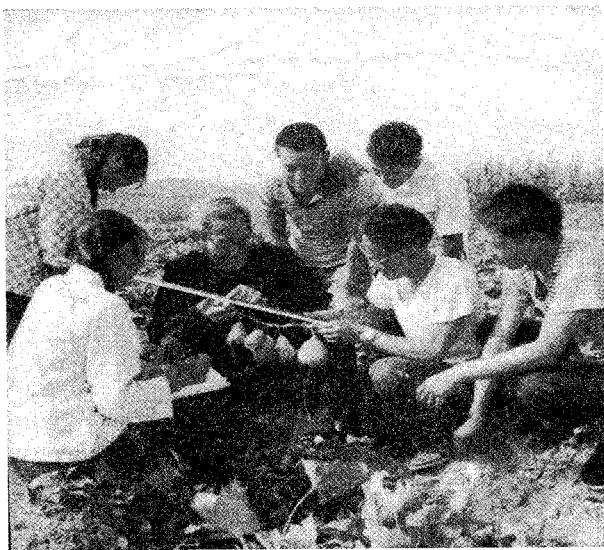
粉碎“四人帮”后，年近7旬的父亲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回到了日思夜想的革命事业中。他发誓要用自己有限的岁月为祖国科教事业做出新的贡献。他捐掉了工资，谢绝了分房，告别了亲人，来到简阳镇金机关，来到农民之中，来到科研生产第一线，开始实施土地科学为农业生产服务，与农业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新方案。

74年12月我生孩子后由于医疗

事故引起大出血，身体极度衰弱。我多么盼望父亲能来看看他的小外孙啊！24号终于收到日夜盼望的父亲来信。我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读着爸爸的来信，然而我读到的是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小翼：您的亲爱的爸爸已经死了。现在您的爸爸是一位对您漠不关心，冷若冰霜，一切要您自给自爱，只知革命，不顾一切的爸爸。我想您在看见人家爸爸热情眷念他们的子女的时候，一定会掉下泪来，狠狠地骂这位死去的爸爸的。但是，请您注意，

* 侯啸碚，侯光炯小女儿。



1974年侯光炯(前排左二)在简阳镇金研究坡瘠地改土和红苕栽培试验

就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挣扎、要斗争,无产阶级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斗争中一点一滴地锻炼出来的。阿爸忙极,每天实在只能以吃饭睡觉的时候,作为休息时间。说也奇怪,阿爸在这个情况之下,连伤风都没有一点点,这是为什么?因为您没有听到战场上需用内科医生这个事实,就说明了原因。阿爸工作比较顺利,抓住大事先干好,干彻底,就是一个秘诀。什么叫大事呢?那就得预先充分掌握情况,分析问题,找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就是大事。

阿爸

1974.12.16 镇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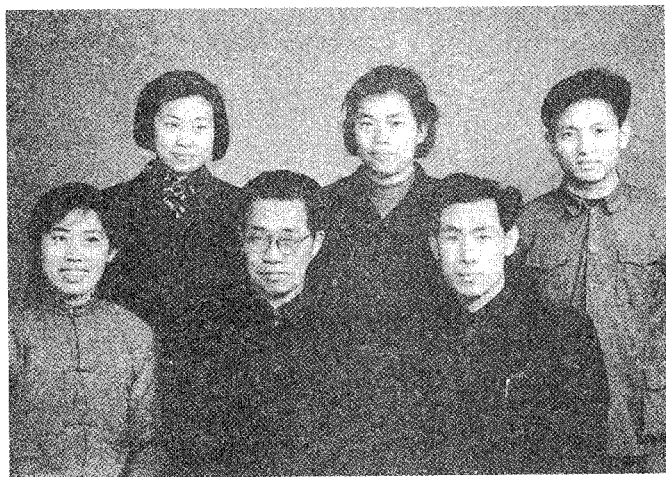
我流着泪读完了信,百感交集。女儿生了小孩,又遭到医疗事故,身体受到极大损伤。盼望离得不太远的父亲来看看女儿和小外孙,这也是人之常情。我并不是想要父亲在经济上给与什么帮助,而是渴盼父爱。

父亲这封信对我无疑是一重撞。开始确实有些怨恨和悲伤,逐渐冷静下来,我回想着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的多少个日日夜夜,是什么在支撑着他顽强地生活着,那无不是由祖国对人民,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现在终于粉碎了四人帮,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党中央又向全国人民发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新奋斗目标。父亲回到了他日夜思念的战斗岗位,这封信是他决心甩开膀子大干一场的战斗宣言。我不由对父亲产生了一种

新的情感:他不只是我们的父亲,他已将自己融入祖国、人民和党的怀抱,他是人民的儿子,也是我们大家的亲人。

热心助人

父亲的一生所奉行的都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他总觉得党和国家给予他的太多,他将自己的生活费一减再减,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将节省下来的钱都交了党费。而就是自己所剩不多的生活费仍然随时拿去帮助其他有困难的同志,受他帮助过的人不计其数,而他自己却经常弄得身无分文,捉襟见肘。他不光在经济上帮助别人,在思想上,生活上,工作上时时处处想着别人,关心和帮助着别人,甚至有许多事情我们感觉到无法理解。给我感受最深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1982年,我刚调回成都科学院不久。一次,我陪父亲到西门外办事,当时已经5点过了。我急急地陪着父亲去赶车回科学院。途中遇到一个农民模样的老人在城内走迷了路找不到回去的车站。他着急地拉着我们询问,当时我对成都也不熟悉,父亲更是连在科学院内都找不到家的人。我客气的告诉老农“对不起,我们都不是本地人”,反身去拉父亲快走。可父亲已不在我身边,急得我四处看,原来父亲又去拦住另外一个行人询问,他连问了几位行人都不太清楚,父亲干脆拉住老农边走边问。望着西下



侯光炯(前排中)与他的儿女们合影,其中前排左一为小女儿嘯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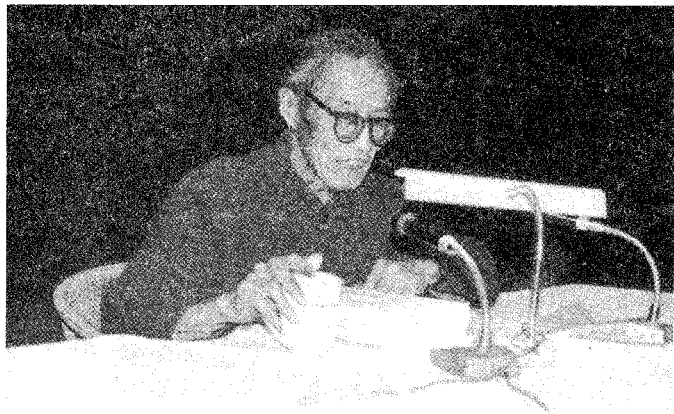
的夕阳,我心里直犯嘀咕“天这么晚了,不知道就算了,犯得着这么热心吗?”勉强跟在他们背后,足足用了近10

分钟,70多岁的热心老人才算为60多岁的糊涂老人问清了回去的具体路线。老农感激得直向父亲鞠躬。望着父亲那快活的笑脸和慈祥的眼神,我似乎触觉到了什么,心中涌起一股爱的暖流。

另一件事就是80年代父亲在宜宾相岭机关工作时所发生的令相岭人民感到崇敬和欣慰的一段佳话。当时相岭有一个人所皆知好吃懒做、好逸恶劳、专会坑蒙拐骗的痞子——陈三,听说区上来了一个全国有名的大科学家,一级教授,而且是一个双目快失明又刚患过重病的80多岁老人,心想他一定有钱,无力,好欺骗。于是隔三差五不是拿假画就是拿假药,不是生重病就是暂缺钱,找到父亲百般纠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后来,周围的秘书和机关的同志们讨厌气愤之极,见他来就赶。嘿!还偏偏碰上一个脾气更“怪”的老头。他知道这是区政府的一块心病,人人厌恶的渣子。但他却生出一种帮助他、启发他、教育他走正路之心。他告诉周围的同志不要赶他,让他进

来,对他十分客气,也“明知故犯”地买下过他的假画假药,给他看病钱吃饭钱。但每次父亲都要语重心长地开导他,告诉他做人的道理,告诉他自己的奋斗经历,告诉他工作的乐趣,真诚地规劝他改正错误,从头做人。次数多了,陈三对这个“有钱”的和善老人也心存一丝感激和敬佩之情,但陈三就是陈三,每次都赌咒发誓要改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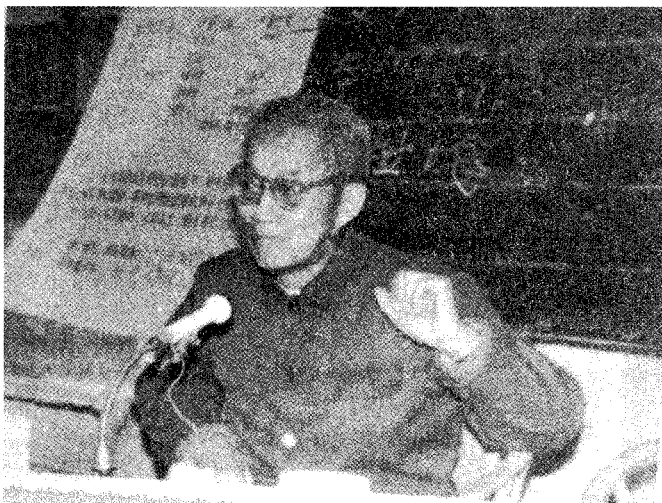
自新,重新做人,最后还是照样行骗。这样持续了一年多,陈三有时也试图正经做人,但不久又故伎重演。后来据他亲口诉说对他震动最大的一次是85年春节,陈三听说侯老拒绝回子女家过年,留在机关继续工作,便拿了几包粗草纸包着的劣质米花粉,打主意今天要在老教授处好好吃一顿。来到父亲住处,父亲正在吃午饭,见陈三来立即招呼他一起吃。陈三上桌一看愣住了,餐桌上只有一盘烧豆腐,一碗蒸蛋,一盘炒青菜。一个大教授过节竟只吃这样简单的食品!望着半瞎的老



80年代侯光炯传达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精神照

人用微微发抖的双手端着碗筷,想着他为了工作家也不回,独自留在机关,对比自己,陈三感到无地自容。这一次他流泪了,对父亲说“侯教授,这次我是真正感觉到自己错了,您等着我改正错误的消息吧”。以后很长时间陈三都没来。一次我去看望父亲时,一个区委的同志告诉父亲陈三终于走上了正道。现在正老老实实做

着药生意,过上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当时父亲非常激动,脸上挂满了幸福的笑容。这就是我的父亲,因为他有一颗爱祖国、爱人民、爱事业、爱亲人的仁爱心,才铸就了他战斗的一生、硕果累累的一生、健康的一生、快乐的一生。



1986年侯光炯在相岭河东免耕所给学员讲课

战胜癌症

文化大革后,父亲迫不及待率西农(原西南农学院)部分老师来到简阳镇金马公社建立了日思夜想的第一个土地科学机关。父亲向公社党委保证用自己的知识和辛勤的汗水改变这个地区土质差、产量低、人民生活困难的落后面貌。在这个向农业现代化进军的最前线,父亲如鱼得水。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忘记了自己多病的身体,不分昼夜地辛勤工作着,思考着各种能提高产量的有效方法,并亲自主持多项科学实验,带博士生,带研究生,带毕业实习生,为农村科技人员、为农民、为学生举办

各种知识讲座。科研取得很大进展,土质改善了,产量自然提高了,农民打心眼里感到高兴。然而,由于父亲太过于劳累,加之农村生活条件较艰苦,本来年龄较大,体质较弱,终于支持不住,1976年在四川简阳镇金机关得了重病。在省委领导的直接关怀下,父亲被“强行”护送到川医和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做仔细检查,确诊为晚期胃癌。医院认为必须马上动手术,无奈,父亲无论如何坚决不肯做。领导通知我们几兄妹到医院帮助一起做工作。

我心急如焚地从桂林赶到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强忍着痛心的泪水来到父亲的病房。第一眼看见父亲时令我非常震惊,父亲虽然脸色蜡黄,消瘦苍老,但他仍然一如既往的充满着坚定和乐观。我没有从他脸上读到癌症的恐惧和哀伤。我紧握着父亲瘦瘦的双手,按照事先的约定反复地安抚和劝慰着“没有什么关系,您得的是严重胃溃疡,只要做了手术,休养一段时间就会好的。”“爸爸,这次是全国有名的外科手术医生陈医生为你主刀,机会难得啊”。爸爸自是讲了各种理由说服我们,他不能做手术。这样反复多次后,父亲语重心长的对我说“小翼啊,你不用瞒我了,我早已知道医院诊断

我是胃癌,并准备为我做胃全切除手术。我知道像我这种年纪的人做这样大的手术有可能连手术台都下不了,即使手术成功,也许能延长十年的寿命,但那只是一具活着的躯体,整天只能坐在轮椅上,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什么也不能干,给别人带来累赘,那样我还不如死了的好。如果我不做手术,也许还可以活个2、3年。我就利用这2、3年时间到科研第一线去跑跑,抓紧时间再干出一些成绩留给后人。小翼啊,我要告诉你的事,癌症这东西是个怪物。你软他硬,你硬他软,我还是要跟它斗一斗,我希望你能理解我,支持我”。我还能说什么呢,父亲早已将自己生死置之度外,全凭着对党事业的无限忠诚生活着、奋斗着。在他的思维中没有多少空隙去容留癌症的可怕和死亡的威胁,也许这正是他战胜和治疗癌症的最好处方。说来也怪,他经各种先进仪器,甚至才从德国引进的最新彩色仪器上拍片确定是晚期胃癌,在他谢绝当时国内最好外科手术医生的好意,执意出院后,经采用民间药方及顽强的调理锻炼,身体还真一天天好起来。三个月后又回到他朝思暮想的科研生产第一线,更加忘我地为人民继续奋斗了整整20个春秋。

四、难忘的情怀



1996年5月侯光炯(前排中)91岁寿辰时
与他的亲人、学生和刘明钊院长(前排右二)合影

特殊病人

95年2月18号这天,我突然接到宜宾免耕所电话通知,父亲在乘坐从长宁到宜宾的小公共汽车途中遇车祸,受伤住院。我急忙乘车赶至宜宾第二人民医院骨科病房。只见父亲全身上着夹板,缠满了厚厚的绷带。望着他被剧烈疼痛折磨得面色苍白的脸,我伤心地哭了起来。免耕所李书记流着泪告诉了我事情的经过:那天,地区通知父亲去宜宾开会,他想顺便去宜宾农校看望一位老战友,他是为父亲的旱地免耕技术推广试验忘我工作而累病的。父亲谢绝了宜宾地区领导的派车,自己带着一个秘书提前去挤小公共汽车,坐在了最后一排的木板座位上。车行至离宜宾几公里

处,由于这里正在维修道路,路面非常破烂,布满了大小泥坑。车行至一个大坑处车身剧烈上跳,下落。父亲整个人被抛起又重重落下,导致脊柱严重地压缩性骨折,肺部受伤出现炎症。李书记边哭边说,不停地后悔和自责。我立即安慰她:“这事绝对与你毫无关系。我了解父亲,他从来不愿意搞特殊,不愿去麻烦别人,占用公家车辆。四川省领导、省农业厅、科委、科协、西农、成都科学院、宜宾地区各级领导多次要为父亲派专车供他使用,他都一概谢绝了,坚持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父亲这时似乎根本没听我们在说什么,他所想的只是免耕所的工作。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躺下呀,旱地自然免耕的试验和推广工作已全面铺开,随时都有新的问题需立即解决,他急得直捶床。我们哭着劝他为了工作一定要好好养伤,在我们的一再劝慰下,他冷静下来开始沉思,然后叫秘书为他记录各项工作开展的方法和步骤。这一段时间他不能走不能动,一方面要忍受伤口的剧痛和并发症带来的巨大痛楚,一方面还要日夜操心安排着所里工作的进行。为了让他好好休息,我给他带去一台小型电视,想让他解闷,后来才知道他竟一次未看。满脑子想的都是工作。他也经常找医院陈院长,但不是诉说病痛而是说他已经好了,可以出院了。事实上由于父亲年岁大骨伤恢复很慢,加之肺部严重感染,褥疮大面积发作,身体状况很差。地区各级领导常去看望他,询问他有什么需要,他只有一个请求“让我尽快出院”。他含泪告诉张专员:“我已90高龄,没有多长时间了,现在正值免耕技术成败的关键时刻,我不能再耽误,请领导理解我。”好不容易熬到他承诺过的一个月期限,父亲已经无法忍耐,坚决要出院,地区领导只有指示医院领导,尽全力保证侯教授出院路途的安全和以后身体的康复。

3月18号这天,我提前来到医院参加护送父亲回免耕所的队伍。父亲早已在秘书的帮助下梳洗完毕,焦急地等待着启程的一刻。医院陈院长一大早就亲自率领外科刘主任,主治江医生和救护车司机一道作了精心的准备。9点多钟,仍然上着夹板的父亲被人们用担架抬出,很多医务人员站在门外,含着热泪用尊敬的目光送别着这位瘦弱刚强的老人。陈院长他们极其轻轻地顺着预先安放好的滑板小心移动着担架,平稳地放

在救护车内的5床棉絮上。汽车慢慢启动了,老人苍白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一路上,技术高超的驾驶员怀着对老教授的无比敬重,发挥出自己的全部技术水平,让车尽量行驶得缓慢平稳。为了减少每一个抖动对老人带来的痛苦,陈院长、刘主任和江医生用自己的双脚和双手托在担架下,遇到大的振动,他们就用自己的全身力量将父亲的担架用双手托起。我学习陈院长的方法坐在担架的一角,一路上望着父亲坚强地忍受着伤痛的折磨,望着他那归心似箭的急切眼神,望着医生们胜似亲人的精心护理,我的心颤抖了。一路上为了减少父亲的痛苦,大家默不作声,细心警惕着每一个振动。这一段原本只要一个多小时的路程竟走了3个多小时。来到免耕所,车还未停稳,父亲就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了。

临走时,陈院长紧握着父亲的双手,激动地说“你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特殊’的病人,也是永远值得我学习的导师和亲人。”



1992年侯光炯(中)与研究生们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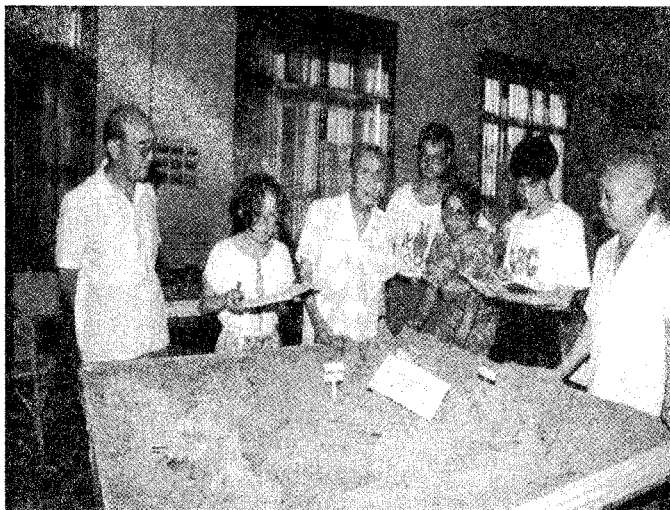
风雨之中育新人

93年正是父亲事业上非常繁忙的一年,当时父亲已88岁高龄。

父亲的一生致力于两大重要任务:一是教书,一是科研。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父亲深深感到教书必须育人。特别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学生中间出现了一些新型贵族倾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脱离工农,脱离实践。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能为工农大众服务,能为四个现代化而拼搏吗?这是他的一块心病,他愿意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艰苦奋斗来做一个示范和表

率,或许能唤起人们的一些警觉。93年10月西农准备给父亲派几十个毕业实习生,父亲还是这样一句话,要我带实习生,就请他们要到实践中来,与我们同生活,同劳动,共同搞科学研究。父亲对这些年轻人充满了期望,生活上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工作上对他们严格要求。他给学生们讲科学,讲理论,讲艰苦,讲奋斗。他给每个学生安排实践课题,并给他们作详细的讲解,制定实验方法和步骤。让他们卷起裤腿拿着锄头和免耕所的工人及科技人员一起到试验地里操作、测试。要求他们每日都要写工作和思想上的收获,作详细的实验记录,分析报告,并不顾自己的疲劳为他们逐篇修改至深夜。

24号这天,父亲带着免耕所的一批同志和几十个西农的实习同学到长宁双河和梅硐镇去做水田、旱地自然免耕技术应用推广的考察,无奈天公下起了大雨。县农业局派了一辆大卡车来。同志们当然是首先扶父



1994年6月侯光炯(左三)在宜宾自然免耕所向
我校青年教师和当地技术人员讲解旱灾成因

亲上驾驶室,其他同志挤着站在后面车厢里。但父亲坚持不坐驾驶室,一定要到后面的敞篷车厢里和大家站一起,无论怎么劝说都不行。望着越下越大的雨,免耕所李书记都急哭了。父亲这时犯了急,他心痛地说“大家都在后面淋着雨,我能安心坐在前面吗?再要坚持我就走着去”。说完就往外冲,无奈最后除司机以外所有的人全部站在敞篷车厢里。大雨不停地下着,望着满头白发浑身湿透的老师还是那么坚强乐观地和同学们手

挽着手站在一起,车上所有的人都流泪了,雨水和泪水洗涤着他们的心灵,激励着他们的人生。

送 别

我永远铭记着这一刻。96年父亲因年老体弱、过度劳累病情实际上已经转化为肺癌。为了未完的事业,他仍顽强地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中秋节这一天,下午我请了假乘火车到宜宾,又乘小公共汽车到长宁。到免耕所时已是深夜12点05分。开门的老陈一见我就说“你总算来了,侯老师今天盼了你一整天,晚上11点都不肯睡下,现在还在等着你”。我的饥饿和疲劳全都没有了,飞奔到父亲床前抱着他骨瘦如柴的双手,望着他因肺癌引起胸腔积水而肿胀的全身和疲惫衰老的面容,我的心都碎了。但爸爸还是那么镇定,那么乐观,他像孩子似的用没有一颗牙的牙床高兴地品尝着我带给他的精美糕点和酥而甜的月饼,不住地说我终于和小翼一起过中秋了。他那么慈祥地看着我狼吞虎咽地将一大碗面一扫而光,又直到老陈将我的住处安排妥帖,才在我们一再请求下躺下睡觉。看着爸爸因胸闷而痛苦地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我的泪水止不住地长流。突然父亲轻轻地叫了一声:“小翼,你再给爸爸唱一唱那首歌好吗?”我知道那是爸爸最爱听的一首歌。我握住爸爸的手,强忍住心中的痛苦,轻轻地唱着“爸爸爸爸爸爸亲爱的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亲爱的爸爸,满嘴没有一颗牙,满头是白发,整天嘻嘻又哈哈,像个洋娃娃……”歌声越来越轻,爸爸像个孩子似的逐渐安稳入睡。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出去一看,父亲又像往常一样,早已梳洗完毕。房间仍然一如既往收拾得干净整齐,光洁亮堂,他又在向助手们安排今天的工作了。老陈悄悄告诉我,父亲昨晚又是整夜因胸胀气闷无法入睡。我的心意更加坚定,前几次都未能说服父亲,这次拖也要把他拖回成都。早餐过后,8点30分父亲起身向外走去,我急忙跟在爸爸身后想去搀扶他,爸爸推开我的手,独自扶着楼梯扶手,脚步沉重地一步一步向下走去,颤抖的手费力地举起,按在过道墙上的电铃上,发出一阵阵响亮的铃声。原来,这是父亲一直坚持多年的老规矩,每天上午召集免耕所全体同志开会,或布置检查任务,或讨论问题,但更多的是学术讲座。不一会儿,

全体人员到齐,爸爸用坚强的信念支撑着病体,主持着会议。声音虽然细小沙哑,但句句掷地有声。他安排了同志们近期的工作后,身体已经虚弱得接不上气来,但他仍拼尽全身力气向派往的西农老师和免耕所的同志们说出他的肺腑之言:“同志们,旱地免耕技术经过大家的努力已经进行了现场全面验收鉴定,它的防洪抗旱、稳步高产成效已充分体现。但我们不能止步不前,要立即开展以下几个项目的研究:一是对旱地免耕技术做进一步深入研究,并努力将它推广到大面积栽培,造福于农民。同时还要重点研究将这一技术应用到防洪抗旱的斗争中去,为永远根治洪、旱灾威胁作出应有贡献;第二,要着手有机复合肥的研究,不能让化肥侵蚀毒害人们的肌体,更不能让化肥破坏土地结构,造成土地的板结和肥效的降低;第三,要着手研究用生态方法来防治病虫害,以害虫的天敌来杀灭它,尽量避免农药的使用,保护人民的身体健康。同志们,我可能已经快和你们告别,但我寄希望于你们,我的灵魂将会伴随着你们共同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奋斗到底。”大家含着热泪报以长久热烈的掌声,我任由泪水流淌,心中充满了崇敬和爱戴。

作为女儿、朋友和战友,那一天我们谈了很多。我一再请求爸爸与我一道回成都做认真的治疗,爸爸却坚决谢绝了。他说我会跟你去医院,但不是现在。你已经了解了我们的目标和计划,这都关系到人们的幸福与安危,我是计划的制定和组织者,你说我能临阵脱逃吗?最后他给我道出了他的心声:“小翼呀,阿爸这一生都在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的幸福拼命地工作着,我知道我的最后也必然是倒在工作岗位上的。”我认输了,苦口婆心的劝说又一次失败了。我与照顾父亲生活的同志详细安排了父亲生活上的问题后,准备乘第二天凌晨5点的汽车去赶7点宜宾到成都的火车,为父亲治病作进一步安排。

愁闷忧伤了一夜,清晨4点起床出来后发现父亲早已穿戴梳洗完毕坐在客厅里等我。我真是埋怨父亲,您怎么能起这么早,我怎么能让您送我上车站。他笑笑说“我送你去车站,怕半夜外面不安全”。这就是父亲,一辈子想到的都是别人,唯独没有他自己。拗不过他,我只得听从。我和老陈几乎是抬着帮助父亲下了楼。坐



1996年病重期间重庆市市委书记、市长张德邻到医院看望侯光炯

上他早已安排老陈叫好的三轮车,匆匆向车站驶去,并在父亲早已物色好的站旁小餐馆里吃了热乎乎的豆浆、油条和包子。我一再恳求父亲回去了,但他执意要看着我上车,实在无法,只得由老陈搀扶着重病的父亲站在餐馆前与我告别,我紧抱着父亲温暖的双手不忍离开。也许是心灵的感应,我感到一股钻心的疼痛,我声音颤抖地说“爸爸,好好保重,等着我”。跳上车后再也忍不住伤心的泪水。就在我昏昏沉沉被车拉着在站外转圈拉客时,我的心突然剧烈跳动起来,全身血液似乎停止了流动,我的天呀,我又看见了餐馆前昏暗的灯光下我深爱的父亲。他还站在那里,充满深情的目光仍注视着我离去的方向。寒风吹拂着他银白的头发,每一条深深的皱纹中饱含着浓浓的情,我扑在窗前拼尽全力感受父亲的爱。感谢车主,无意中为我创造了与父亲再见一面的最后机会,这就是我与站立着的父亲最后的一别。我永远铭记这一刻,铭记着父亲对子女最深厚最真挚的情。

这次分别一个月后,即96年11月4日,我们最亲爱的父亲带着他心爱的事业,带着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最后倒在了工作岗位上。悲呼,痛呼,壮呼!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注:文章略有删减)

(责任编辑:郝龙)



情系大地

——忆侯光炯教授二、三事

□文 / 龙再忠*

我是1974年9月经推荐上大学,于1977年7月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土化系的大学普通班学员,毕业后留校工作,分配到土化系土壤教研组。同年10月国庆节后,系党总支书记蒲富永同志找我谈话,说侯光炯老师是学院的一级教授、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中国科学院院士),其助手余杰同志前往非洲执行援外任务,目前侯老师由于眼睛高度近视,行动不便,侯师母已去世多年,几个子女都不在身边,工作上、生活上急需人照顾。经系领导研究并请示学院临时党委同意,决定你到侯老师身边工作。希望你多向德高望重的老专家学习,业务上得到提升;尽心照顾好侯老师的工作、生活,在侯老师的言传身教下,工作生活双丰收。于是,第二天我便从学生四舍搬往黄桷村侯老师家中,开始了长达八个年头与侯老师朝夕相处的日子。

一、主编 77 万字的《中国农业土壤概论》专著

1977年10月底,中国农科院土壤肥料研究所所长

高惠民与侯老师在北京商议,邀请相关土壤专家编写一部土壤学专著,拟定名《中国农业土壤概论》,编书工作经费由中国农科院土肥所提供,预算经费4万元(含印刷费在内)。本书的大纲构思等业务技术由侯老师全权负责。集中所有承担编写任务的专家到重庆市北碚区写书,年底前完成本专著的初稿。

11月初,由中国农科院土肥所邀请的编写专家陆续抵达北碚,他们分别是东北农学院、辽宁省农科院、山东农学院、江西红壤研究所、华南农学院、广东土壤研究所、云南省农科院、山西农学院、陕西农科院土肥所、四川农学院、四川农科院土肥所、四川水科所、西南农学院及中国农科院土肥所等单位的26名专家。主编是侯光炯、高惠民;编写者:王守纯、王楚云、区沃恒、叶惠民、江渊、刘寄陵、阎钺、朱世清、李纯忠、李笃仁、李鸿恩、何万云、陆发熹、陈自健、林成谷、张乃凤、张马祥、张代树、贺湘逸、郭兴嘉、黄少贤、曾觉廷、赖守悌、蔡霖生。

侯老师承担了本书大纲及概论、最核心章节“土壤

* 龙再忠,曾于1977-1985年作侯光炯助手,现任四川科技职工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1977年11月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在原西南农业学院实验农场拍摄纪录片《土壤学家侯光炯》的镜头，左二为侯光炯

肥力和土壤普查”的编写任务。

在整个集中编写《概论》一书的过程中，我的任务是负责编写组专家的食宿及协助侯老师完成他承担的章节记录，因为侯老师眼睛高度近视，看书写字非常吃力，写书由他口述我记录，然后念给他听，进行反复修改。每天工作到翌日凌晨二、三点才休息，而早上六点钟就要起床，几乎是脚还没睡暖和又该起床了。当时我才25岁，睡眠又好，有时在记录中坐着就不知不觉的睡着了，整天呵欠连天，非常疲倦。那时重庆的冬天比较冷，特别是凌晨气温很低，双脚几乎冻僵，我们住的北碚区招待所条件较简陋，那个时期都无空调、电视和取暖器。有些专家晚上10点左右就睡觉了，而另一些专家则坐在被窝里写书。我在侯老师的房间里记录，只能干挨冻。我和四川省水科所的张代树老师同住一个房间，凌晨回房休息时想洗一个热水脚，但每次水瓶的热水都被张老师用完，我只好用棉毛裤裹住脚倒头便睡，到早上起床时脚还冰凉，后来我脚长冻疮红肿，晚上又痛又痒，非常难受。

值得欣慰的是，我所负责的生活工作得到了各位专家的表扬。那时物资很匮乏，计划经济时代猪肉要凭票供应，粮食也要凭粮票购买。为了改善专家的生活，我积极向负责管理侯老师生活工作的刘秉臣同志（他负责协调侯老师与学校的联系，原任学校知青办公室主任，该机构完成历史使命撤消后，学校安排他负责侯老师日

常工作生活，同志们戏称刘主任为支老办主任）反映，由他出面找北碚区商业局联系，给编书组各位专家特批了一些肉票，交餐馆改善专家伙食。我在负责各位专家生活时，设计了一张表格，每周一张，上面有姓名、日期及早中晚三餐，每顿饭后当着他们的面在相应的空格中记录，用了餐的打√，未用餐的划一横，每周结算一次，将收来的粮票、钱交餐馆销账。整个编书的三个多月时间，钱粮均未出现一分钱差错，各位专家都对我认真负责的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大约在1977年11月下旬或12月初，《概论》初稿还没写出来，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按中宣部安排，为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作准备，宣传一批又红又专德艺双馨的老科学家，从北京来西农专题拍摄新闻纪录片——《土壤学家侯光炯》。

其中有侯老师在田间打土钻指导学生对土壤物理性认识、研讨的镜头。导演选择了西农实验农场的一块旱地，参加人员有侯老师、曾觉廷、庞帮域、实验员王××老师（女）和我。因我最年轻，要求我必须穿一件色彩较鲜艳的红色棉毛衫，以增加对比度。另外，在北碚招待所会议室召开编写组编书会议，由侯老师和专家们商讨《概论》的修改镜头。因《概论》初稿还未完成，为了拍摄需要，会议桌上摆了一部封面由高昌森老师用毛笔书写的《中国农业土壤概论》（草稿），中间全部用空白的稿笺纸填充，摄影师对着《概论》和编写组开会反复拍摄，完成了拍摄任务。78年春节我回老家大足县过年，很多亲人都观看了土壤学家侯光炯教授的纪录短片，在纪录片中看到了我的镜头，都非常羡慕我，而我的父母认为我在亲戚面前给他们挣了面子，感到特别荣耀。

1978年1月下旬，编书组完成了《概论》初稿的编写任务，各位专家就要离开北碚返家过年了。西农领导和侯老师召开了总结欢送会。记得侯老师在会上问中国农科院土肥所张马祥老师（山东人），你在重庆住了三个月有什么收获。张答，我学会了一句地道的四川话。一天他上街买东西，看见两妇女在吵架，于是他咬牙切齿地用椒盐四川话模仿说道：“老子惨你龟儿两耳屎（扇两耳光）。”这时所有专家听了都开怀大笑。会后，各专家都到北碚采购土特产，那时物资非常匮乏，北方的专

家绝大多数都选择买了四川竹编的笕箕，根据大小不等每个0.2元—0.5元。我按照学校领导的意见，用学校的华沙牌小卧车分别将20多位专家送机场或火车站，终于顺利完成了编书任务。

77万字的《中国农业土壤概论》经修改、统稿、定稿，于1982年2月由农业出版社国内公开出版发行，并赠送了我一本書作为参加本项工作的纪念。

二、参加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

78年4月底，学院办公室接到四川省委办公厅通知，新任省委书记赵紫阳同志拟于5月2日在成都金牛坝宾馆召开四川知名农业专家会议，听取对四川农业发展的意见。5月1日晚上，侯老师和蒋书南(昆虫学家)教授应邀乘软卧到成都，学校给我买了一张硬座票

同车到成都。第二天早上到了成都火车站，省委接待办的同志已在车站等候侯、蒋老师。小车接上我们

直接驱车去了金牛坝宾馆。侯老师非常关心人，考虑到我硬座坐了一个通宵，跟接待办的同志商量，请他安排车送我到成都分院招待所住下补瞌睡，说他会后也要到分院商量筹建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土壤研究室事宜。但当天下午，他从金牛坝宾馆打来电话，让我带上相关资料到金牛坝宾馆找他，他发言需要相关数据。于是，我便赶到了金牛坝宾馆，很荣幸的旁听了农业专家的发言。会上赵紫阳书记、分管农业的副省长刘海泉及省委秘书长周颐等领导都非常专注的听了各位专家的建议意见。侯老师从培肥土壤地力的角度发表了意见，他说，以粮为纲扩大农作物复种指数，一年四季土

壤上都一茬一茬种满了农作物，早稻收了又种晚稻，甚至收了晚稻还要放水种小麦，中稻收了再留再生稻；旱地上收了小麦种玉米，再套种红苕，加之，单一大量的使用化肥，土壤中PH值被化肥残留的硫酸根改变，土壤中微生物遭到破坏，致使土壤板结，肥力下降。侯老师建议因地制宜作好农作物布局，提倡有机无机肥搭配使用，特别是在冬水田中放养红浮萍，红浮萍有固氮的功能，可培肥地力。适当减少农作物复种指数，减少简阳、仁寿等地的棉花种植计划面积。此话一出，全场鸦雀无声，都替侯老师捏了一把汗。在当时计划经济时代，这是一种离经叛道的想法，赵书记也只有采取回避的办法，不表态。

会后，省委采纳了专家的部分建议，提出因地制宜的搞好农作物布局，对农作物复种指数过高的问题，认为



1980年4月西南土壤普查顾问组专家侯光炯教授(前排左七)

与贵州省江口县领导及土壤普查工作人员合影

为“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宜种一季水稻的，收获后蓄冬水放养红浮萍。同时，提出了在四川“水路不通走旱路”的口号，坳田，望天田，不能蓄水的田改种宜旱作物。总之，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搞好农作物布局。省委文件一出台，对指导四川农业生产起了关键作用，也为四川粮食丰产奠定了政策基础。后来群众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

在金牛坝宾馆参加会议的两天时间，我随侯老师与赵紫阳书记同桌吃饭，赵书记平易近人，称我为“小专家”。晚上，专家们看了由香港电影明星陈思思主演的武打功夫片《云海遇弓缘》和《家》等几部电影，省委、省府、成都军区的很多高级领导都来金牛坝宾馆观看电影。

侯老师参加完金牛宾馆会议后，到成都科分院与刘允中书记、马识途院长商议筹建恢复土壤研究室等事宜。由于院方与侯老师的想法有较大差距，侯老师便委托学生张先婉全权筹建土研室，自己带领一帮人回到简阳镇金基点从事土壤研究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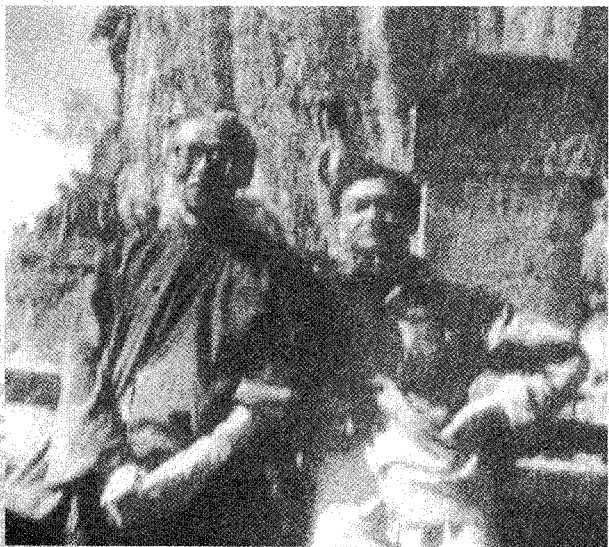
1979年，根据中央指示，全国开展了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四川省农牧局土肥处王寿廷处长找到侯老师，对搞好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心中无底，希望侯老师先搞试点，摸索经验，便于指导全省开展此项工作。宜宾地区农牧局的彭隆学（参加了宜宾地区第一次土壤普查，侯老师的学生）被委任为技术总负责，他受原地区科委主任张子先委托，专程到镇金邀请侯老师到宜宾开展第二次土壤普查试点。侯老师欣然应允，便带着一帮人从简阳转移到宜宾开展工作。经过考察，选择了江安县铁清公社作试点。后来，侯老师考虑到铁清公社的土壤在宜宾地区不具备代表性，又带着部分学生对珙县、泸县、富顺、长宁、高县等地考察，最后选择了山清水秀的竹海山麓——长宁县相岭镇为土壤研究的科研基地。

1980年4月，为了指导总结推广西南三省土壤普查工作，成立了以侯老师为组长的西南土壤普查顾问组，成员有：西南农学院的侯光炯、四川农科院土肥所的汪国良、四川省农牧厅土肥处徐杰；云南农科院副院

长叶惠民、云南农学院的黄楚平教授、云南农牧厅土肥处王文富；贵州省农牧厅土肥处吴美禄、贵州农科院土肥所窦质彬所长、贵州农学院汪汾教授。西南顾问组一行（徐杰因工作原因未同行）乘火车到贵州遵义。清早在遵义下车时，才发现侯老师放在行李架上的提包被盗，内装的换洗衣服及送学生吴子铭的礼物全部丢失。在遵义宾馆，贵州省分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王朝文（后任省长）宴请了顾问组。餐后，立即乘汽车赶往铜仁地区的江口县，验收该县土壤普查试点成果。当时贵州省领导非常重视，由省农委温主任和省农牧厅伍厅长陪同，并在省政府交际处租了三辆伏尔加轿车供专家乘坐。那时的伏尔加轿车是配给副省级以上干部乘坐的。三辆伏尔加有两辆天蓝色，一辆黑色，贵州省领导安排侯老师、窦所长乘黑色的那辆。大约上午9点过从遵义出发，经湄潭、印江、思南，过乌江，于晚上十点多钟到达江口县。

参加完江口县土壤普查验收后，原路返回贵阳。因头天晚上下雨，贵州的山路黄泥湿滑，车辆在快行至印江县时，侯老师乘坐的黑色伏尔加下山路时刹车失灵，当时公路左边是几十米的悬崖，前方同样是弯道悬崖，如果汽车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幸好驾驶员有丰富的跑山路的经验，他死死将方向盘向右边打，用车头去撞路边的岩石。当车头撞上岩石的一刹那间，汽车引擎盖反弹向挡风玻璃，钢化玻璃成了蜘蛛网。我当时坐在副驾上，头撞向挡风玻璃，头上立即被撞了一个鸡蛋大的青包，脖子僵硬不能左右扭动。不幸中的万幸是坐在后排的侯老师和窦所长毫发无损。这时，温主任和伍厅长立即重新调整车辆，让侯老师换乘温主任的上海牌专车到印江县休息，同时在印江县给我找了一个当地有名的理发师来给我端颈子（按摩）治疗（由于这次车祸，造成了陈旧性损伤，以后每当天气发生变化，我的脖子就僵硬不灵活）。稍事休息后，我们又驱车继续赶路，前往湄潭贵州省茶叶科研所。该所的科技人员吴子铭是侯老师的学生，听说侯老师要路过湄潭，诚心邀请侯老师一行考察茶科所并作学术报告。

参加完贵州江口县土壤普查验收后，西南顾问组一行从贵阳乘火车到昆明，继续对云南省大理州下关



1980年5月作者龙再忠（右）与侯老师（左）在昆明龙门合影



1983年9月侯光炯(中)在甘肃省榆中县考察黄土资源

市进行土壤普查验收。

在昆明吸取了贵州的教训，云南省农牧厅土肥处租用了一辆中巴车，西南顾问组全体同志都乘坐一辆车。那时没有高速公路，从昆明到下关第一天晚宿楚雄，第二天才到达下关市。第三天开始对下关土壤普查进行野外实地考察验收，然后在室内听土壤普查技术负责人廖士长汇报，查阅相关资料，最后西南顾问组写出验收意见。验收工作结束后，大理州领导陪同顾问组专家游览了蝴蝶泉、洱海、苍山等风景区。从下关回到昆明，云南省农牧厅领导安排专家到石林、西双版纳等地考察，因大家工作都很繁忙，谢绝了省农牧厅领导的好意，就近到滇池、西山龙门游览，晚上乘昆明到成都的火车返蓉。

回到四川，顾问组对四川绵阳地区绵阳市刘家镇开展的土壤普查进行了现场验收。结束了西南三省土壤普查试点验收后，顾问组聚集一起总结，最后将书面总结报告国家农业部，提出农业部安排部署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时应重点考虑的注意事项及建议。

大约在80年5月，农业部在浙江省富阳县召开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会，邀请侯老师参会，并在会上就开展土壤普查作学术报告。侯老师作报告后，整理录音的同志反反复复听，不明白其中一句话，便找到我询问。他们不明白侯老师在开场白中讲道：“这次跟随我

的龙爷爷来富阳参加农业部召开的土壤普查会，非常荣幸，部领导给我创造了一次向土壤学界同行学习的好机会。”整理录音的同志很迷惑，他们认为侯老师年龄都很大了，他还有爷爷吗？这个龙爷爷(叶叶)是人的名字或真的是侯老师的爷爷，他们不明白。我对他们说，录音中的龙爷爷就是我，因为侯老师说话比较诙谐幽默，加上我不善言谈，平时不爱笑比较严肃，侯老师说我年少老成，像爷爷样子，故称我为龙爷爷。没想到他平时开玩笑叫顺了口，在大会作报告时亦称我为龙爷爷。听了我的解释，整理录音的同志都哦了一声，说侯教授乐观开朗太好玩了。

记得从富阳回到宜宾，安排侯老师住原宜宾地区第二招待所平房、木地板的一个套房，侯老师住里面的大房间，我住在外面的一个小单间。本套房曾经是文革中宜宾王刘结挺(原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张西廷夫妇指挥武斗的办公室。当晚十点多钟，我的肚子剧痛难忍，在床上打滚，侯老师非常关心人，听见我呻吟后，非常着急地从里间快步走出来，由于眼睛高度近视，不小心一头撞在门框上，我听见声音很响，撞得很重，但侯老师忍住疼痛，仍然扶我到宜宾市医院看病，诊断我患了急性肠炎，住院治疗。第二天，侯老师拎着一大包水果、营养品又到医院看望我，看见侯老师额头上青紫，被撞的一个大包块，我内心非常激动，深感内疚，又倍感温暖。

三、从事土壤自然免耕研究

具体时间记不确切了，一天上午，侯老师正在科分院给他安排的宿舍内很吃力地写东西，有一个穿着非常朴素、打扮得像农民模样的人求见侯老师，并自我介绍叫莫先武，西农农学系毕业，现在成都市第一农科所工作。他说他异想天开的新搞了一种水稻栽培模式，即将旱地垒垅种红苕的办法转移到水田中，秧苗就插在土垅临水面的两侧，太阳光直射到裸露出水面的土垅上，目的是提高成都地区早春土壤地表温度，促使水稻秧苗早生根早分蘖。由于是宽窄行种水稻，既促进了行间通风，又增加了阳光对水稻的照射，增产效果较显著。莫先武老师说他的试验地就在成都五块石，距科分

院不到 10 公里,请侯老师考察指导。侯老师听完介绍,非常高兴接受邀请,立即驱车前往试验田。

侯老师在试验田仔细的查看了水稻半旱栽培的对比试验,在同一块田,施肥水平、水稻栽插时间及田间管理完全相同,明显看到半旱栽培的水稻长势要优于老栽培模式,非常高兴,取名“莫氏栽培法”,立即邀请莫先武到宜宾长宁县相岭基地推广半旱栽培技术。

第二年春天莫先武同志来到相岭基地推广示范“莫式栽培”技术。他没有考虑到两地土壤肥力的差异,仍按成都的水稻栽培规格示范,立即遭到长宁县各乡镇来学习的农技人员的反对,认为“莫氏栽培”的株行距宽了,一亩田要少种很多秧苗,他们接受不了。双方



80年代侯光炯上山考察

意见不一,互不相让僵持着。这时,我向侯老师和宜宾地区农业局邓福元副局长建议,选择一块比较大的水田,一分为二,半边按“莫氏栽培”规格种植,另半边按长宁县当地农技人员的要求规格种植,施肥水平和管理水平相同,到秋后收获自然见分晓。侯老师听了当即表扬我:“还是我龙爷爷想得周道,大家就按龙爷爷的意见办。”后来实践证明,将两种规格综合折中优选形成了全宜宾地区乃至全省推广的半旱式栽培株行距标准。以后侯老师从理论上对半旱栽培技术进行总结、提

升,形成一整套自然免耕理论及技术,在我国南方水稻生产省区推广,为我国的粮食增产作出了卓越贡献。本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1983年8月下旬,我随侯老师赴延安参加全国水土保持学术会,会议在西安报到,统一乘汽车前往延安。西安至延安400多公里,那时既无高速公路,铁路又没修通,汽车要开10多个小时,从上午9点出发,中午在黄陵县吃午饭。饭后参观了黄帝陵,晚上近10点钟才到达延安。“水保会”还安排代表考察了位于陕北绥德县的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站,该站科技人员在恶劣的环境条件下,艰苦创业,与天斗,与地斗,治理黄土,搞节水农业保持土壤不流失的研究实验。非常荣幸的是,在延安我还聆听了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的报告。当时,耀邦总书记从青海省考察后直接到延安,在延安大礼堂发表了题为“植树种草,反弹琵琶”的演讲,号召西北地区农牧民种树种草,改善生态环境,发展畜牧业,增加农牧民经济收入。因地制宜,改变单一的粮食生产方式,多种经营发展农牧业生产。

在参加“水保学术会”期间,甘肃省国土资源勘测设计院领导邀请侯老师到兰州考察作学术讲座。会后,我们又从延安到兰州,参观了兰州五泉山公园,考察了兰州兴隆山原始森林及甘肃省榆中县黄土资源。

我于1980年10月因照顾夫妻关系,从西南农学院调四川省自然资源研究所工作,虽然工作关系不在西农了,但仍在长宁相岭侯老师科研基地,在他的指导下从事科研工作。直到1984年底,因工作需要,资源所领导把我从相岭抽调回所,调整到科研处从事科技管理,结束了在侯老师身边近8年的工作生活。

回顾在侯老师身边的日日夜夜,在他的潜移默化的熏陶下,我学到了老科学家孜孜不倦探索科学真理,一生勤奋做学问,热爱土壤科学,心系亿万农民的崇高精神,是我以后克服工作生活中各种困难的不竭动力,也是我人生中终身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责任编辑:刘广生)

校档中的张敷荣

编者按：张敷荣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和教育发展道路的领军人物之一，其教育思想丰富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科学理论，为我国新世纪教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并且对当前及未来我国教育科学改革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张敷荣独树一帜的教育思想更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本期《档案拾遗》收录了他部分科研、教学等珍贵手稿，以展现张敷荣的教育思想与学术风采。

教与学的关系 1. 1

一、党的教育方针

(1) 华东地区教育学会秘书长会议总结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的“同是社会主义教育观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尊重人相结合，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青年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更完善、更具体、更明确。

当前教育突出的问题是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严重。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单靠学校和教育部门不能完全解决。（《中国教育学会简报》第35期，82.7.10，第2页）

二、教和学的关系：

(1) 叶圣陶说，教是为了达到不用教，讲是为学生不用讲。吕叔湘说，学生的学，应由被动地学转为主动地学。二者分别由教师和学生两个角度探讨地解决教与学的关系问题，体现了我国自己的教学论的优秀传统。（合上9页）

张敷荣关于《教学论》的研究手稿

高师科研新局面

一、重要论断、命题和思想

(一)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把教育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柱,提出普及教育是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前提。

(二)马克思指出:“一方面为了建立正确的教育制度,需要改变社会条件,另一方面,为了改变社会条件,又需要相应的教育制度”(《马克思全集》,16卷654页)

(三)国内外实践证明: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按教育规律办事,30多年来,我国教育事业的曲折过程更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四)第三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指出:目前“我国教育科学研究远远落后于教育事业的发展,落后于实践。”建议各地党委和教育行政部门把教育科学研究工作放到重要议事日程上,“……关键在于进一步提高对开展教育科学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为开创教育科研新局面提纲认识上的障碍)

(五)二年前(1958年2月)“联合国文教组织教育研究

张敷荣关于《高师科研新局面》的研究手稿,该研究以《不断改革研究生的指导工作,培养高质量的教育博士》为题,发表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版。

《课程评价理论评介》^① (李有发) 外语教学与研究
 一、课程理论的产生——柏拉图在《Glaucou》中说“没有经过检验的课程是不值得学习的”。夸美纽斯对编写和教授课程有一系列论述，斯宾塞关于什么知识最有教育价值的理论，都孕育作课程评价思想。19世纪60年代英美掀起教育测量运动。1864(英)费希尔(Fisher)提出改革当时通行的根据标准簿(scale-book)的考试方法。1894(美)赖斯(Rice)编了拼读测验。桑代克的《精神与社会测量学绪论》是本世纪教育测量方面的名著，他在《教育成果测量的本质》中提出“一切存在的万物都有它的量，而彻底认识它不仅了解它的本质，也了解它的量”。在此思想影响下，出现了比内智力测验量表，斯滕(Stone)标准算术测验，奥蒂斯(Otis)团体智力测验，都强调客观、标准化。1930年后，守旧者认为客观化、标准化的测验不能对学生的学习和教育效果作出全面评价；在艾德领导下进行了“八年研究”，探索新的评价方法，其主要目的是实验核心课程(core-curriculum)，以泰勒为首的评价委员会进行研究，以全面发见人

张敷荣讲授《课程评价理论评介》的教学笔记手稿

教学评估

- 一、评估的实质：不仅是师生维持教学关系必要的信息传递和反馈，也体现社会与个体的关系（它本身是教学必需手段，但常被考试这类外在机制所代替，成为对教学的“指挥棒”，评估结果的量化和评估内容固定化、评估过程程序化，使之无活力，远离教学的现实；如科举那样使士人步入死胡同深渊。青少年有丰富多彩的生活为考试阴翳笼罩；评估与对象的对立，使教育违背了培养人的目的，这是目前教学出现许多弊端症结。
- 二、评估的对象：现代评估理论始于泰勒的目标模式（订教学目标—组织教学—评估教学效果）；60年代末出现比较重视个性发展的评估模式（如目标游离模式、应答模式等），但目标界定愈周密，评估对象的人被某些外在的东西取代了（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模式引入人类社会关系，人看成一部机器或生物组织，行为主义认为人可以被朝任何方向塑造）知识本身当作教育最终目的，因而评估没有把完全的人当作评估对象，分教异化为与人相对立的东西。现代化在首先是人的现代化，造就有血有肉有个性、的全面发展的人，提高整个民族素质，真正以此为评估对象。

张敷荣讲授《教学评估》的教学笔记手稿

编者按：刘尊一（1904—1979），四川合川人。1946—1950年在四川省立教育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任教授，之后在原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任教育系教授兼系主任。她从中学时代起即积极参加革命运动，加入先进的中国共产党；她被捕前是党的优秀儿女，释放后却嫁给国民党官员，被称作“刑场旁的婚礼”；她虽被误认为叛变了党，失去了革命气节，却一直默默为党做掩护工作，并与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早期重要人物如宋美龄、周恩来、邓颖超、刘清扬、赵君陶、陶行知等过往甚密；她多次申请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却未果。所幸在文革中，她并未受到很大的冲击……

刘尊一的一生充满曲折与传奇。此文为1950年刘尊一盼望党组织能批准她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向党组织说明所有情况而写。



刘尊一

刘尊一自传（上）

□文 / 刘尊一

一、我出生的家庭：（一九零四）我的家里有十五石谷子田地的祖业（在合川县王场）。我的父亲是一个勤苦工读还没有赶上考功名就遇着停止科举，而改进新式师范学校（无力维持到毕业）的人。他教过私塾、做过劝学所（等于文教局）的“视学”（督学）以及县政府的秘书等职务。他是当时县中的“维新派”。在辛亥革命前就和我姑父（陈飞龙，留日士官学生），一同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共同在县中起义。我在六岁时，就被送进他们在场上新创办的女子小学（是我父亲和姑母们用庙产兴办的）读书。那个学校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读的书，不是《女儿经》，《三字经》，或“子曰诗云”，而是“新教科书”。印象更深的，又是父亲时常到庙会上去演讲，提倡破除迷信，提倡“放脚”。姑母与学校一位女教师组织了“天脚会”，经常劝导亲戚们“放脚”。父亲和他的朋友们，把庙上的产业提出来三分之一做学校经费；还劝导庙上的和尚“还俗”，并帮助他们入学读书。我十

年前偶然回到家乡，还遇见一个我父亲劝导过的“还俗和尚”进过中学的学生吴某（已经五十多岁了），还在称赞他老人家的为人呢。

二、我的小学时期：（一九一二——一九一九）我在王场小学受完小学教育以后，母亲说我没读过老书，根底太差，要我在家里搭读一个私塾，把“四书”、“幼学”、《左传》、《诗经》、《大学》、《中庸》、《礼记》等读完了，父亲从成都工作回乡。他允许了我的要求，送我到城里县立女校当作升学。因为城里离王场家乡有三十里路，我只好一人在校内寄宿。这对于养成我的“自己管理生活”的习惯很有关系。而当时校长有一个比较前进的女先生赵亮操，常常诵题“富国强兵”及女学为“强国强种”的基本等道理，勉励我们努力用功，做一个“复兴民族的人材”。因此，我就非常用功，成绩常列班上的前三名。在高小读了一年半，就和一位姓任的同学到重庆投考“省立第二女子师范”（现称重庆女师）。家里因为父

亲远在成都,母亲还要照顾小弟妹们,不能护送我们,就把我们送上一艘运米的木船,拜托船走□□到重庆时送我们上岸,到学校门口。这种远道的旅行,对于我们两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确是新鲜有趣的、富于教育意义的。到校之后,考期已过,幸好学校当局还特别通融,办一次补考,才侥幸的考取了。

三、我的中学时期(参加革命工作:学生运动):(一九一九——一九二三)一九一九年秋,我考取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第四班。当时的校长是个老举人饶先生,教务主任是周文钦,舍监是三个女的。管理得很严,不单是平时不能出校门,就是假期中,也必须家里有人来接,才许离校。出门时坐在轿子里,还必须把轿帘闹放得紧紧的。所学的功课,除了普通师范学校课程外,常有“贤妻良母”一类的训语。

但是,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潮流、新思想,传播得很快,我们在上完硬性的基本课程之外,经常偷偷的传阅看外面来的书刊,如《新潮》、《少年中国》以及安娜琪主义的小册子之类,我的思想与行动大受影响:在校中即



1921年8月,重庆第二女师部分女同学剪发后留影,
右二为刘尊一

与同学组织了班会,参加川东学生联合会,举行抵制日货等活动,置学校舍监等的严厉干涉于不顾。

一九二一年夏,川东道尹公署教育科长陈愚生(留日学生,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主办“暑期讲习会”,邀请北京、南京、东京、成都来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多人:邓中夏、黄日葵、恽代英、萧楚女、穆涪波、王德赵、别泗英诸先生来渝讲学。我每天必风雨无阻的前往听讲。他们宣扬新文化,提倡“科学”与“民主”。我深受感动。嗣后,即

在女师校中掀起了“反封建”的及“民主的”“择师运动”,几被学校当局所黜退。我父亲在成都接到学校当局的通知,赶到重庆来看我,严厉的申斥我,把我接到乡戚但周梅君(但懋辛太太)家中,不许我再到学校去过问学校风潮的事,一再的要我回家自修。次年得陈、穆、王、别四先生的补助,每位资助我五十元作路费,没有得到家里的同意,就启程赴北京。当时陈愚生先生,从北京回川不久,并且和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及“工读互助团”的一般人都很熟识,就写了介绍信给我,要我去北京进“工读互助团”。但是我到京时,找到邓中夏和李大钊两先生,才知道该团不能维持,已解散了,乃由他们介绍考进女高师补习学校,得以与赵世兰、赵君陶(世萱)、郑育才(现名倚红)、刘亚雄、蒲振声、张平江等成为同学。我于课外常请邓中夏先生(他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员,后来又成为共产党员,北大国文系讲师,《向导》编辑)补习国文。邓先生热心教导,常从百忙中抽暇为我改阅作文及日记,我的作文得到相当进步之后,就常以短文投稿于《学生》及《妇女》(商务出版)等杂志。而邓先生与李大钊先生往来还很密,我也常在他们的指导之下,阅读《新青年》、《向导》以及马列主义入门书刊等。而京汉铁路工人的团结斗争的实际情况,常常从邓先生与北大同乡刘伯青处知道得很详细,几乎等于耳闻目睹,对于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很感到同情与兴奋。而我当时因为家庭没有接济,是在一个国会议员家中(胡鄂分家)为他的小孩上自习补课,每日二小时,每月报酬十五元,半工半读的,自己认为自己也是工人阶级的,所以更加同情爱国的革命运动。

四、我的大学时期(参加革命运动):(一九二三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三年我考进了北京大学政治系,亲得陈启修(现名豹隐,是当时政治系主任)、陈独秀、高一涵、李大钊、鲁迅诸先生的教导,又得同乡同学刘伯青的介绍,参加了中共的会议(但是不久因为与刘伯青私交断,就未赴会了)。在北大“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气氛中,不能长久的沉默在死读书的图书馆里(中间有一年多是沉默在图书馆内埋头读书的),终于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参加了实际行动。后来又参加了国民党的左派市党部(翠花胡同)——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时,与同学组织了“报国团”,积极参加活



刘尊一的挚友：赵君陶和丈夫李硕勋（李鹏父母）

动(我任该团的宣传部主任及副主任),曾动员北京英国公使馆二百余工人全体罢工,水电俱停,给英国人以很大的打击。这年冬天,北京举行要求“关税自主”的国民大会,订在天安门开大会。北大同学齐集第三院,被军警层层包围,不得前往。我与王昆仑、杜钢百、张国焘、郭青涛等打退军警,领带着同学奋勇冲出,直奔天安门开会地点。会后,同学才发现我的被撕破了的棉衣,已为颈上流出的热血湿透了,顿觉头昏眼黑,不支倒地。同学们把我抬送法国医院,医治了一个多月才好了。一时北京的革命师友,都纷纷来慰问,这不啻是对我参加革命工作的一大鼓励。事后与吴奇、谭祖光,杜钢百、周士方等组织了“新军社”,经常受到邓中夏、赵世炎、夏之栩、张国焘、杨子烈、刘清扬的指导,参加了北京所有的学生运动。一九二六年夏,被北京学联推选为出席全国学联的代表,到广州开会。这都是直接受到共产党的领导的。因此,受到北京军阀特务的忌视。在这年秋天,由广州开会回到北京以后,一连被捕了两次。最后,在十月间才由李大钊先生拜托康心之夫妇,替我化了装,护送我到天津,陪我住了两天后,并代为办理转船赴沪的手续。

原来我在这年“三一八”惨案后(三月底)和赵世兰到过上海,此时赵世炎(她的胞弟)、赵君陶(她的妹妹)已先到沪,他们和罗亦农、李硕勋介绍赵世兰入共产党,也要我慎重的再参加一次入党仪式。所以我在四月间

又和赵世兰在中共上大支部,又庄严的举行了一次入党仪式。同时还考进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三年级下学期。后来在暑假期间到广州参加了全国学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党又叫我回北大去。但是,才回去不久,就被特务注意了,连遭两次逮捕。在十月间,党又叫我离京赴沪。到沪后,即正式在上大社会学系四年级上课,一面把党的组织关系转入了上大支部,在工作方面,经常得到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诸同志的指导。教授中常常得到瞿秋白、施存统(现名复亮)、彭述之、陈望道诸先生的指导,同学中常常得到欧阳继修(现名阳翰笙)、何成湘、钟复光、赵君陶、李硕勋、何幻生(名洛)诸同志的切磋之益。

五、北伐时期的工作:我在上大,同志们认为我在北京曾参加过学生运动:“五卅”、“三一八”等运动,颇为努力,所以除了上课以外,又派我参加上海市的妇女运动,及国民党的工作。因此我担任了“上海市各界妇女联合会”的常务理事及国民党市党部(左翼的)执行委员。而杨之华(瞿秋白太太)和侯绍裘诸同志主办的景贤女中,也要我教几点钟的书,又要我做了“女教职员联合会”的理事。同时,在这一年(一九二六)的冬天,党内许多同志都到汉口参加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去了。“江浙区党部”的代表会议中,推选到我做候补区委,兼区委妇女部书记(当时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诸同志都是区委),于是我就日夜的忙于工作,直至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三日。

六、与何幻生结婚:(一九二七年一月)何幻生(名何洛)与我在北大同学,在“三一八”惨案后,我在北京不能住下去了,不得已在三月底转学上大时,他也转入了上大,又与我同班。但是,因为当时男女同学才开放不久,男女社交还不很自然的原故,在他转入上大以前,我并不认识他,倒因为北大女同学特别的少,尤其因为我是当时北大的惟一的四川女生的原故,他倒认识我。到了上大之后,他经常来找我,接触的时间比较的多。后来,赵君陶与萧月华和我想租一幢一楼一底的小房子(当时上大在闸北青云路的民房,无宿舍,必须自行在外设法居住),他自愿来想参加共同使用。他与萧住楼下,我与赵住楼上,此后他就天天在我上学时,为我服务,非常殷勤。不久,我向罗亦农、赵世炎提出介绍他入党,被党通

过了。他被派到上海学联工作,我被派到市妇联以及国民党工作时,又天天同进同出,感情就逐渐好起来了。我们常常抽暇到黄浦公园和“六三”公园去散步。我们共同补读因为出外参加工作而缺席的功课,并细读《社会进化史》和《共产党宣言》及《共产主义 ABC》以及当时的社会学书籍。最初君陶有点不大赞成我们的过分亲近。但是,在她与李硕勋结婚以后,我们就更进一步了。在一九二七年重阳历年时(原文如此),就与他宣布结婚。他对我样样都好,就只有一件事情,在共同生活了两个月

之后,他才告诉我,他是曾经父母之命,在家里结过婚的,有一子,已三岁。当时我气极了,严责他“不诚实”。次日,就搬到杨之华的三楼上,与他分开了。经他再三解释以后,我才原谅他的苦衷,而恢复了感情。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仍独自住在法租界“妇女工作社”内。

七、被捕入狱

及狱中概况: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三日,国民党蒋介石背叛人民,投降帝国主义者,发动清党的次日,我与何幻生、吴广互、张世瑜诸同志同时被捕入狱,监禁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一间极小极黑暗的地下室中(男同志们另外禁在一间大房子里),半月后,吴、张二同志因为有人取保,都相继出狱,何君则因为曾代表全国学联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坦白自认以后,就壮烈的牺牲了。我曾多次被严刑拷打,逼供同党与组织状况,虽遍体鳞伤,亦毫不为动,没有说出半点组织情况。逼我写“悔过书”及“脱党声明”,我也死不肯写,而同在狱中的一位区委秘书韩步先,在受刑以后,就招认了,把组织完全交出来了,带着特务兵去把区委破获了,把文件及赵世炎与罗

亦农都提来牺牲了(原文如此)。还时常带着特务到街上去发现交出同志。这些情形,倒陪衬出了我的忠贞不二的气概,深深的感动了当时审问的所谓军法官和看守的士兵,警备司令杨虎的太太和好些工作人员,都常常到地下室来看我,请女工替我擦药,喂我的饮食(因为当时受伤颇重,手不能举起)。后来,在五月中,第四次审问时,我仍然不吐实况,军法官汪少涯才告以“何洛同志被害经过”,诱我招供。我当时即承认了自己是中共党员,请求立即处死,语毕即昏倒不省人事。嗣后,即大发烧

热,卧病不起,狱中毫无医药设备,病中至为悲惨。当时,友人张平江,因为是时与国民党西山会议派接近的关系,清党后接收了我原来工作的左翼市党部,做了执委和妇女部长,与潘宜之(此时任第二路总指挥部秘书长兼市党部执委)、陈群(政治部主任)等都认识。听说我的生命有危险,也赶来看我,并向杨虎、陈群、潘宜之等力说我



上海第三次工人暴动胜利后,当选的部分政府委员合影,前排右起:汪寿华、杨杏佛、王晓籁、罗亦农、王景云、何洛(刘尊一第一任丈夫);后排右起:王汉良、丁晓先、郑毓秀、顾顺章、侯绍裘、林钧

的学识与能力之优异,极力为我缓颊,企图能够设法使我脱险。据她事后告诉我说,当时她听见说我被“判处死刑”将于当晚执行时,正值她在家里挂窗帘,她惊闻之下,立刻从凳子上跌下来,即到市党部找到潘宜之。与他乘车到龙华警备部来看我、保我。在车上特别提到我的为人与能力。大概把所有的好词句都搬弄完了,其用心之苦,其友爱之诚,实令人感佩!此后,潘又和张平江来看过我。潘于详询我的病状,及所需物体后,就托人送来,并请女工为我侍候汤药。及见久不痊愈,即亲向杨虎、陈群说情,请求准予送入医院治疗。并即亲自驾车送我到法国医院,每日必来医院探视一二次,情谊殷殷。我在法国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烧热还是没有减退,医生只

是检查出来我已怀妊五六个月了(原来我并不十分知道这一层)。到后来,烧热变改为每隔一天发一次,每日由清晨起,体温即逐渐增高,至中午达最高点,下午又逐渐减低,饮食不能进,仅靠打葡萄糖,苟延残喘。正当医生束手无策之际,忽然南京总司令部以蒋总司令介石名义来了一个电,命杨虎、陈群二人立即把我押解到南京总部清党委员会,听候审判。潘宜之与张平江虽一再力保,均属无效。以一久病奄奄一息之人,又经旅途入狱,其惨况自可想见。幸于到南京后(六月中)稍经询问,即转押于第一监狱,次日潘氏复自沪赶来,送以日用必需品,并特为在外延医入狱诊治(嗣后才听说这样的病就是“急性疟疾”。因为有妊不能服用“奎宁”,只能服效力较小的药),并托典狱长胡逸民便中照拂,请女工服侍汤药。一日,彼来出示其上蒋总司令函稿,大意谓“彼愿以生命保释刘尊一,若认为彼之此项行动为有罪,彼愿恳辞其本兼各职以谢罪。”并且告诉我,他和蒋介石的谈话情形说,蒋介石要他警惕,恐防来看我,会被我伤害。他答以“宁愿送给我去伤害”云云。七月间,孙传芳大军反攻,逼近南京,彼于将随白崇禧(第二路总指挥)赴战场之前夕,又来狱中探视,并出示其新诗,其中有“匈奴虽未灭,但愿并肩齐向前”之句,很恳切的说出了他对我的爱慕。

八、意外的结合:一九二七年八月初,在孙传芳反攻南京的炮声隆隆之中,全城惊惶之际,忽与第一监狱的全体政治犯一同被释,当时与我同在狱中的有同学同志刘竹贤(现名安霖)及女同志曾佩等。竹贤比我先出去一

刘尊一的第二任丈夫潘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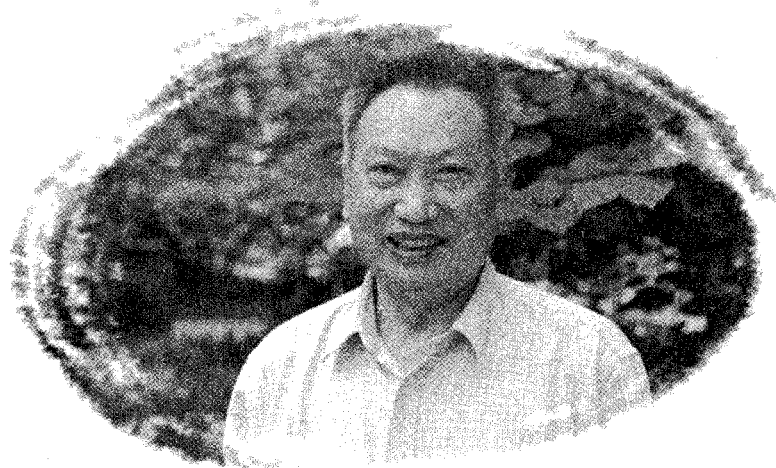


天,他替我找到一家小饭馆做的铺保,后来听说我们之所以得转移的出来,一方面是由于刘竹贤同志托了曾佩与其女友王某在典狱长及清党委员会立委李烈钧身上做了工夫,一方面是由于潘宜之曾重托过李、胡,请其设法“通案”办理,再则是由于南京的紧张与人心的惶恐(当时蒋介石已经下野到日本去了)。我出狱后,在南京不知东西南北,幸得曾佩同志的照料,在她家里住了两天,就送我到慕慈医院。三日后,即产一男孩(取名小苏,现名则仁),因久系监狱,历经刑病的痛苦,既少饮食,又乏运动的原故,生产时整整痛苦了三天三夜。对于生下地的苦难的遗腹子,立刻就发生母性的极度热爱,每每于哺乳之际,于无家可归万般感伤之际,抱着他饮泣痛吻。九月初,孙传芳打败,主力全部消灭了。潘宜之随白崇禧凯旋归来,彼从胡典狱长得知我的住地,即同来医院看我。此后每日公毕,即来院探视。记得有一次他来,遇见刘竹贤同志也在座。后来我就托竹贤带着信和旅费(廿元)到上海区找赵君陶和组织中的同志,设法来接我。但是,他到上海以后,大概因为组织破坏的太厉害了,无法达到任务。不久就离沪回四川了,渺无音信。而我住在医院里,每天渴望君陶的到来,每次闻脚步声,即希望是君陶,而结果总是宜之。他每次来总是牢骚满腹的,对于汪精卫等又欢迎蒋介石上台,对于蒋介石的自私、独裁,极为不满,常说他十八岁就在军校参加革命党(同盟会)。因此,他就被开除了。十几年来,追随孙总理革命,冒了许多危险,把个人幸福牺牲了,现在得到这样的革命结果,是太令人失望了!他并且告诉我,说他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站在谭平山、邓颖超、周恩来、侯绍裘等一条战线上,打击过西山会议派以及他在上海与杨虎、陈群搞得不好。因为他颇不赞成他们的作风。他这样天天来纠缠着我,恳求我允许和他结婚。我因久候君陶无消息,而沪宁同志多遭毒手,组织无法联系,在举目无亲、人地生疏的情境中,迫于他的情义,乃同意迁出医院,与他同居。当时心中实打算暂住几天,以待时机。不料他竟邀约其同学多人,略事铺张了一番。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洪秋冰)

编者按：胡锦矗，著名大熊猫研究专家，博士研究生导师，1929年生于四川省开江县，1955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生物系，195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班，共出版专著18部，发表论文160多篇，获国家、省、部委级奖10项。他对大熊猫生态生物学研究一直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被国际上公认为大熊猫生态生物学研究的奠基人。



世界大熊猫研究权威——胡锦矗教授

密林竹海中的深情寄托

——记大熊猫研究专家胡锦矗教授

□文\邓力*

貔貅，猜猜看，是什么动物？它是今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大熊猫。可在一百多年以前，人们对它的认识，就像对“貔貅”这对生僻的汉字一样陌生。据说，当时国外有位传教士来到中国西部的深山密林，在当地山民的家里，这位传教士见到一张熊猫皮，他被这张神奇的兽皮深深地吸引了，他极尽想像，推测这是只什么样的动物。从兽皮的色斑上，传教士看到了某种

从未见过的动物的可爱形象。但实在想不出这是什么动物。他花了点钱买下那张兽皮，带回了欧洲。

不久，这张神奇的兽皮出现在法国巴黎的自然博物馆里，面对这张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熊猫皮，一些自以为见多识广的欧洲人得出了让那位传教士啼笑皆非的结论：世界上没有这种动物，皮是假的！他们哪里知道，熊猫正生活在远离尘世的中国西部的莽林竹海中。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100多万年来，大熊猫恬静自在，与世无争地

* 邓力，男，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生活在丛林竹海中。而后来,生存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劣,大熊猫家族艰难地走到了现在,静候着真正爱它的人前来叩门。

一位叫胡锦涛的科学工作者走进了深山密林。

二

胡锦涛,中国大熊猫研究专家,1955年本科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生物系,1957年硕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班,现任四川南充师范学院生物系教授。

爱动物,爱草木山水,爱及祖国的一切,是什么时候,胡锦涛在自己的生命中融进了深刻的内容?

胡锦涛的家在开江县一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庄。在他的记忆中,家乡的小村庄在一块平坦开阔的河谷地带,两岸郁郁葱葱,烟笼林覆,山中有飞禽走兽,清澈的河里游着鱼和虾。故乡的山山水水生机无限,给他带来好多好多的欢乐,他对大自然、对神奇的动物世界怀有深深的迷恋。

“有一次,我爬到一棵很高的树上,逮了一只小斑鸠抱回家喂养,没想到小斑鸠不吃不喝,没过两天,就活活饿死了。后来,我爬上树枝观察斑鸠妈妈怎么喂小斑鸠,一连观察了好几天,终于摸索到了小斑鸠的习性,当我再次逮到小斑鸠时,我就学斑鸠妈妈的样子,将油菜籽

和米汤噙在口中,让小斑鸠在我口中啄食,开始我有点怕小斑鸠尖尖的嘴会啄破我的唇舌,但一看到他可怜饥饿的样子,我就放大胆子,张开嘴让它啄食。它的小嘴啄着,我口中痒痒的,喂了它两次,我就完全习惯了。我开始体会到当小鸟妈妈的艰辛。日复一日,小斑鸠长得羽翼丰满,十分可爱,见到我就发出欢快的叫声,我真把我当妈妈了。这时,我又感到了当鸟妈妈的乐趣。直到读大学时,我才明白,鸪鸽类的鸟哺雏时就像这样,小鸟在母鸟口中啄食,母体从嗉中分泌出一种鸽乳,这就像人类喂给婴儿的母乳和牛乳一样。鸽乳是小斑鸠所必需的养料,而在我口中的米汤正好代替了鸽乳。我还养了一群家鸽。我在它们的尾部拴上不同的鸽哨——有用大半个乒乓球贴上带裂纹的葫芦皮做的低音哨,我们叫它莽儿;有用竹制小管做的高音哨;有用核桃壳做的中音哨。当群鸽飞向广阔的蓝天时,十几种鸽哨齐鸣,简直是一支美妙的管乐重奏,真使我陶醉。”

作一名生物学家——在与大自然的接触中,一个寄托终生的理想在少年胡锦涛的心中潜生暗长。

带着这样的理想,胡锦涛走进了西南师范大学,在施白南、戴藩璠等名师的指导下,进入生物学科的殿堂,成为老师们最喜爱的弟子。1955年秋天,胡锦涛从西南师范学院毕业,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班,一步步进入科学研究的殿堂。

三

70年代初,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法国总统蓬皮杜先后来华访问,向我国提出赠送大熊猫的请求,周恩来总理指示林业部迅速派人到野外生存的大熊猫进行调查。

国家林业部和四川省有关部门立即派出了一支由省林业厅副厅长任队长的考察队,在动物研究方面已经崭露头角的胡锦涛担任了考察队副队长职务,从此与大熊猫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走遍岷山、大小凉山、秦岭等地区,调查了解大熊猫生存情况。

他们发现,这种100万年以前广泛分布在中国的动物,由于受人类活动范围扩大、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劣等因素的影响,生存空间已经退缩到青藏高原西部边缘的一个很小的范围内。调查统计的数据表明,世界上大约



胡锦涛在野外考察大熊猫

只有 1000 只熊猫还活着。

大熊猫生存的现状,令胡锦矗忧虑不堪。作为生物学家,他当然知道,任这种情况继续下去,要不了多久,大熊猫就将在地球上消失。如果消灭了一个物种,不论花多少代价,也不能再创造它。大熊猫是一种极具生态意义的物种,被誉为“国宝”。它是大自然的产物,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与死神争夺大熊猫,拯救世界上最珍贵的野生动物,胡锦矗把这沉甸甸的责任担在了肩上。

从 1974 年开始,胡锦矗与科考队员一道,从川、陕、甘交界处经岷山、邛崃山脉到凉山大风顶,行程九万里,对大熊猫的生存状况进行了全方位的科学考察。大熊猫出没的地方,往往山耸谷深,竹葱林茂,人迹罕至,有的地方,连药材商也不敢去闯,稍有不慎,就有掉下千仞绝壁,粉身碎骨的危险。且不说发现大熊猫行踪、收集生态生物资料之难,就是走路、吃饭、住宿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些考验,胡



胡锦矗与他一生情牵的大熊猫

锦矗没放在眼里,长期的野外生活,使他有一根比普通

人壮实的神经。让他忧心如焚的是大熊猫面临的恶劣的自然条件的威胁。像岷山地区一次大规模的竹子开花,就饿死了 130 只熊猫,占当时熊猫存量的七分之一。为了拯救大熊猫,他豁出去了。

“1981 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和一位记者在那里追踪一只野生大熊猫。我们在一片积雪上发现了它留下的新鲜足迹,沿着它的足迹,我们又追了好几里,终于在一条狭隘的兽径上,看到它可爱的模样——雪水把它浑身洗得洁净鲜亮,黑毛如漆,白毛似银,闪着富有生命力的光辉。

记者高兴得差点叫起来,我刚提起相机,谁知道熊猫扭头就跑,我们追呀追,它一会儿钻进竹丛,一会儿摇摇摆摆走到崖畔,像在故意逗我们玩。后来,到了雪坡上,它凭着一身厚厚的皮毛,不怕竹枝扎,不怕乱石

砾,像坐滑梯一样,一骨碌下了雪坡。我也跟着它‘坐滑梯’,没料到一个趔趄,摔了一跤,一根锋利的竹尖刺中了我的眼角膜。当天晚上,我的眼睛肿得像只烂山桃。同志们为我上了药,但是疼痛折磨得我无法入睡。夜深了,我躺在野外观察站的帐篷里,听见风雪呼啸,林涛澎湃,我的心不禁又飞到了大熊猫的身边。我想起成都动物园那只叫瞎瞎的大熊猫。由于外伤,它已经双目失明,据推断,可能也是竹尖刺伤了眼角膜。可怜的瞎瞎,生活在永恒的黑夜之中。现在,我和瞎瞎简直是同病相怜了。是的,大熊猫对我来说,已经是同生死、同命运的亲密伙伴了。”

几天以后,胡锦矗从险境中奇迹般地清醒过来。他与中外科考队员一道,经过数年的观察和缜密的科学研究,不仅发现了大熊猫的作息时间、发情期、雌雄个体心理和生理变化,还掌握了大熊猫在配种期间,强弱争斗,按获胜者依次有序地进行交配等鲜为人知的内幕。

从密林深处走来,胡锦矗在世界大熊猫研究领域开创了四个第一:第一次摸清了四川大熊猫的资源;第一次发现了用熊猫的粪便可以了解熊猫群体的年龄结构;第一次发现了熊猫间的社会关系,其社会结构是以母兽为基础;第一次发现了熊猫的分布规律是朝向东南的迎风面。胡锦矗以此奠定了他在世界熊猫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

胡锦矗的研究引起国际生物学界的密切关注。著名动物学家莫尔斯和夫人撰写的《大熊猫》一书这样评价: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支持,胡锦矗正在开拓未来最重要的、最振奋人心的野生动物保护研究的处女地。英、美、德、瑞士等地的记者和动物学家在访问了四姑娘山下的熊猫之乡后,连篇累牍地在报纸和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说对于熊猫的复兴,保护网显然是重要的,但归根到底在保护中起作用的是人;而胡锦矗就是其中一个典范。不仅在野生动物研究比较落后的中国,胡锦矗在

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是出类拔萃的博物学家，这样的人实属罕见。

胡锦涛共出版专著 18 部，发表论文 160 多篇，获国家、省、部委级奖 10 项。他对大熊猫生态生物学研究成果一直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被国际上公认为大熊猫生态生物学研究的奠基人。不仅如此，他的研究范围还广及环境评价、珍稀动物保护等领域，先后完成了国家和省级多项重要科研项目，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为 24 个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的规划与建成、葛洲坝和二滩等国家特大型水电工程的环保方案和环保对策、大熊猫栖息地工程启动的论证与报批等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作为教师的胡锦涛还为国家高质量地培养了包括博士、硕士在内的各类专业人才数十名。他是“四川省科学界精神文明标兵”、“全国优秀教师”、“优秀研究生导师”等称号获得者。1986 年，胡锦涛首批获得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3 年，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一等奖。

胡锦涛与科学工作者们的出色工作不仅使人们从稀有动物的角度认识了大熊猫，更从生态意义的角度，从大熊猫与人类社会休戚与共的关系中认识了大熊猫。前些年，大熊猫的主食箭竹在四川北部大面积开花死亡，大熊猫的生存再一次面临威胁，人们唱着大熊猫“明天的早餐在哪里”的歌子，开展了大规模的抢救大熊猫的行动，范围后来扩及海外。



胡锦涛认真研读相关著作，致力于大熊猫研究

大熊猫们知道，胡锦涛是它们的朋友，人类会保护它们。在卧龙自然保护区的大熊猫，一般不再害怕人类，有时还会闹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来。一个农民赶着自己的羊群回家，惊讶地发现有一只大熊猫混在羊群中，一本正经地扮着“羊相”进了羊圈，饿了肚子的它，混进羊群争食来了，小家伙在那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才离去。

四

为了大熊猫，胡锦涛舍弃了许多原本应该拥有的东西：妻子临产的时候，胡锦涛没能守候在她身边，留下多少遗憾；由于长年生活在深山密林，难得回一次家，每次敲开家门，望着小女儿一脸陌生的表情，胡锦涛无比的愧疚。为了让女儿了解爸爸工作的意义，胡锦涛让妻子带上女儿到卧龙，让女儿来认识大森林，认识比花儿更可爱的大熊猫。在那里胡锦涛自豪地向女儿介绍卧龙特有的动植物，娓娓地讲述着美丽的大熊猫一个又一个鲜活的故事，如数家珍。女儿说太美了，太美了！胡锦涛告诉女儿，这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可爱的家园，我们有责任去保护它。女儿懂事地点点头，小小年龄的她多少了解自己的爸爸。

从那位爱斑鸠的少年成长为一位世界知名的大熊猫研究专家，胡锦涛的一生倾注了对大自然、对大熊猫的爱。因了胡锦涛的出色工作，我们的国宝得到了有力的保护；因了大熊猫的存在，丰富了胡锦涛的人生内容。对大熊猫的爱，这在胡锦涛看来，是同对祖国的爱连在一起的。爱祖国，爱祖国的一切，原本是不需言语表白的情怀。

（本文选自《缙云山下一支歌》（第一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责任编辑：郝龙）

编者按：走过川东师范学堂、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即将开始西南大学寻根之旅的第三站——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她历经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时期，饱经沧桑，但始终坚持在艰苦中求生存，在斗争中求发展，以服务社会民生为学校发展宗旨，亦为今天西南大学的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南大学寻根（之三）

——四川省立教育学院

□文 / 胡小京

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以下简称川教院)在西南大学的历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她历经战争岁月，长达18载。在这里，留下了师生共同抗争的音符、为国服务的热情、团结奋斗的业绩，使之最终成为当时四川省内专门培养中等学校、社会教育师资及农事教育、农业推广人才的最高学府。

一、在裁撤危机中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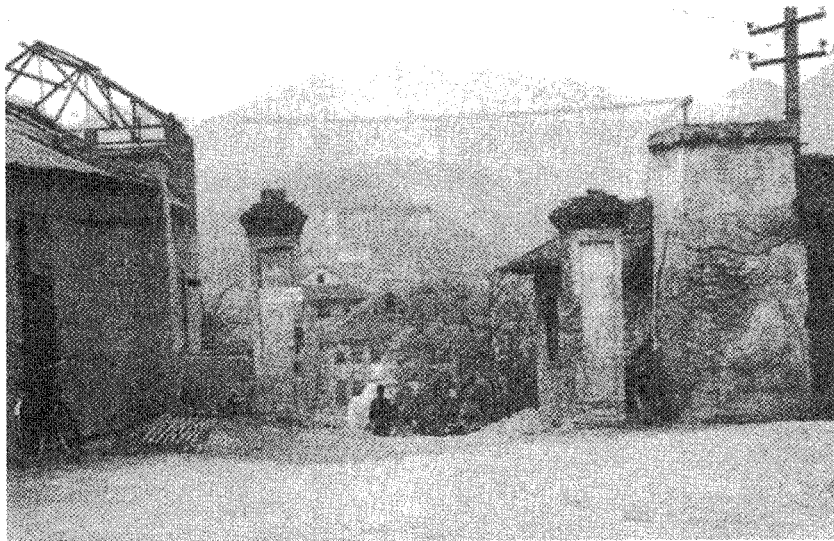
四川乡村建设学院成立后，为培养乡村建设人才，推动乡村建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

首要的难题是经费不足，自辛亥革命后，四川即陷入军阀割据的状态，各军阀划分“防区”，划区而治，各军致力于争夺、扩大防区，无心顾及教育及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直到1935年1月贺国光率领的国民军事委员会参谋团入川，中央势力进入四川，川政才逐步得以统

一，防区制才渐告结束。然而，四川的半独立状态被打破后，使得四川军阀更不愿向乡村建设学院投入经费，导致学校原设置课程无法全面开课，部分课程形同虚设。1936年，学院“经费更加拮据，多为现任院长自行筹垫，全院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军阀统治造成的混乱局面严重影响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其次，四川乡村建设学院面临被裁撤的危险。1935年教育部先后派专员来校调查，认为学院“名实不符，和教育部所属各校的现行学制系统不合，故‘应另定处理办法’”；同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训令另拟组织章程及预算草案，呈候核定，11月又训令改为四川乡村建设研究所；1936年1月，省政府又下达指令“谓该院既因经费支拙，办理诸感困难，自应另筹妥善办法以资结束。”四川省政府也想把学院改为临时性的农业技术员培训班。学院面临被解散的命运，这激起全院师生的不

满和强烈反对,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护校运动,发出快邮代电,阐述开办乡村教育的重大意义,请求改组四川乡村建设学院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经过全院师生和学院当局的据理力争,以及省内外有识之士的热心呼吁,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四



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校门

川省政府最终收回成命,于1936年8月下令将学校改组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1937年2月教育部准予立案),高显鑑为首任院长^①。

高显鑑,1893年生于广西桂林一个世代书香门第之家。其父高星衡(1865-1928)开馆授学享誉乡里,继而考得前清一甲进士及第,宦游广东、四川。高显鑑少小即随父入蜀,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四川法政学堂,十八岁即在四川大学执教,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1931年四川善后督办公署任命高显鑑为江津县长,1932年,他于江津白沙成立了四川平民教育促进会,是四川最早的乡村建设机构。在高显鑑领导下,四川乡村建设学院成为四川省大规模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军基地,后川教院推行的社会教育区域、范围、工作遍及四川省的大部分地区。为了培养乡村教育的师资力量,1933年高显鑑又创办了“江津乡村简易师范学校”并任校董事会董事长。高显鑑任川教院院长后,为了解其他地区办学的经验,派人到山东邹平、河北定县进行考察,以期相互参酌比较,以便制定出更加适合于四川乡建运动的具体试验措施;为了扩大乡村建设运动的影响,指导乡村工作的实施,便于及时了解和交流川外的情况,1936年创办了《现代读物》杂志,高显鑑亲任社长。该刊先后有社会各界人士撰稿,如1940年的《四川专号》就有:总编辑杨若瑜的《纪念抗战三周年与四川专号》、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生产教育办法》、时任四川财政厅

厅长的甘绩鏞的《四川财政之今昔观》、川军将领邓锡侯的《四川的安定与安定的四川》、郭沫若的《先乱后治的精神》等。

在院长高显鑑的领导及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川教院逐步发展为四川省乡村建设运动的中心和培养中小学教师和乡村建设人

才的重要基地。

二、在抗战硝烟中发展

川教院改组成立之初,系科设置只有乡村教育系(后改为社会教育系)和农事教育系,学制4年。院以下设三大部,总务部设主任一人,管理全院行政事务;教导部设主任一人,负责规划和处理全院教务工作;研究实验部设主任一人,规划并主持全院研究实验事宜,还领导农事试验场、地方教育实验区、各级实验学校以及乡村教育等。改组后全院学生有90人,教职员48人。教师中有不少人曾在国外留学多年,学识渊博,且在国内从事教学多年,教学经验丰富。如园艺组主任曾慎,是法国里昂大学硕士、巴黎大学博士,回国后曾任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浙江省蚕丝改良场技师兼研究部主任、河南大学教授兼生物系主任、国立四川大学教授等职。畜牧兽医组主任赖向农毕业于瑞士国立福利图农科大学,历任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教授兼农业工程组主任、重庆大学农学院特约教授等职。教务长胡昌鹤则是美国卫斯理大学哲学学士、纽约大学教育研究院硕士、博士,曾任湖北省立文科大学教务长兼教育系教授等职。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于1937年12月1日在重庆办公,重庆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沦陷区的许多大专院校及中等学校纷纷迁往大后方。川教院所在地重庆沙坪坝、磁器口地区迁来了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药学专科学

校、国立中央工业职业学校等。川教院在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下,吸引了不少著名的专家教授来院兼课任教,他们带来国外先进的教学经验及办学理念,带领全院师生积极进行教学科研探索,为川教院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1937年到1945年先后担任农业教育系主任的张范村、詹纯鑑、陈国荣以及担任社会教育学系系主任的王欲为、赵廷为、宋谋欧都是当时著名学者。张范村是留美农业硕士,回国后历任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农业大学等校教授,1937年应聘到川教院兼农教系主任,讲授《普通畜牧学》、《家畜鉴别学》等课程。詹纯鑑曾学于比利时最高学院,并担任该学院农业工程师,回国后曾任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教授,1940年到川教院教授《农学气象学》、《生物统计学》。陈国荣毕业于法国凡尔赛国立园艺学院及孟伯里国立农科大学蚕桑科,回国后历任中央大学、西北农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教授兼园艺系主任、复旦大学农学院院长,1941年到川教院讲授《果树园艺》、《苗圃学》、《柑橘学》等课程。王欲为曾获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硕士学位,担任过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员,回国后历任湖北省立教育学院教务长、厦门大学文学院教授、燕京大学教育系兼华北协进会实习处教育股导师,1937年秋到川教院讲授《乡村教育》、《社会教育》、《教育英文选读》等。赵廷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



丁肇中(前排中)与家人合影,父亲丁观海和母亲王隽英在抗战时期曾任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教授

学教育研究科,历任安徽大学、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教授,1941年8月应聘为川教院教授兼社教系主任及教育专修科主任,并讲授《普通教学法》。宋谋欧是留学英国的教育学士,回国后历任国立成都大学教育系主任、复旦大学、北平师范大学、重庆大学、云南大学等校教授,1941年任川教院教授,讲授《教育史》、《教育思潮》等课程。此外,川教院还聘请教育名家汤茂如来社会教育系讲教育,农事教育系聘马寿微,王翎金教授农学专业课,国文系聘赖以庄主持系务讲授“韩文”、国学导读,罗根泽教文学批评史,吴组湘讲小说写作,陈白尘教戏剧,商承祚讲甲骨文,钟稚璠讲文字学,邵组平讲词选,董季安讲文选诗选,段熙仲教曲选,张圣奘讲中国通史,孙佺工教文学史。著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1942-1945年)曾就读川教院附属小学,他的父亲丁观海、母亲王隽英均曾任川教院教授。

为促进学院研究与学术交流,特别是为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川教院还经常邀请国内知名学者专家来院作报告及讲演,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教育、文学艺术、哲学、自然科学、国际形势等多方面。当时重大商学院院长马寅初,重大工商学院院长冯君策,光华大学校长张泳霓,英士大学校长杜佑周,中央大学教授、作家徐仲年以及洪深、梁漱溟都曾到学院作学术报告或讲演。^[2]川教院充分利用现有师资,推行适合于抗战建国的社会教育,并逐渐扩大系科设置,逐年增加了教育、文、理等系科,适应战时需要,开设大量战时课程,引导学生抗日救国。同时,还利用暑期组织学生深入农村宣传抗战。学校专门设立了农村服务指导委员会,指导暑期农村服务团的工作。

抗战开始后,沦陷区流亡学生来川人数大增,川教院学生人数有明显增长。川教院规模不断扩大。1937年度全院只有学生163人,到1940年学院各系组共计265人^[3]。抗战结束以后学生人数急剧增长,1946年比1940年增长了近一倍,七系学生人数达446^[4]名。教职员工的规模总体来看也呈上升趋势。就保存下来的档案资料显示:1936年乡建院开始改组为川教院,当年新聘教职员有胡昌鹤、罗浚等38名,其中新聘教授9名。1938年有教职员63名,到1945年增加至112名,其中教授近40人。

川教院为适应抗战形势，适时调整办学宗旨。在1937年的组织大纲第一章第二条明确规定“本学院注重乡村教育以养成乡村建设人才为宗旨”。抗战全面爆发后，根据中国经济“以农业为基础”，“支持长期抗战而确保其胜利的前途者，仍当以农业建设中求之”，川教院的同仁们以乡村建设为目标，开展关于乡村建设的种种问题的研究、实验和教育等。1938年8月，奉教育部令，川教院将乡村教育系改名为社会教育系，农事教育学系改名为农业教育学系，办学宗旨修改为“仍以乡村建设为号召，造就高初级农业职业学校及乡村师范学校师资”。1939年10月，四川省政府咨请教育部请颜歆为院长，并颁布调整办法，确立川教院的办学宗旨为“侧重培养各级师资及本省其他大学所不能造就之专门人才”。此时，川教院实为四川省内专门培养中等学校师资及社会教育、农事教育、农业推广人才的最高学府。

三、在艰苦斗争中成长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从沦陷区迁入四川的几十所大学相继复员，急剧减少了四川省内中学生的就学会。作为省属唯一的师范院校，川教院必须扩大招生，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1946年，川教院重新修订了组织大纲，改办学宗旨为“研究高深教育学术，培养社会教

育、农业教育人才，并视本省需要训练教育行政及各科教学上实用人才”。并遵照四川省参议会关于扩充系科的决议，结合当时社会的需要及学院已具备的条件，决定增设数学系、英文系，并将农业教育学系的农艺组、农产制造组扩充为农艺系、农产制造系。秋季招生时，1947年秋将原农教系园艺组扩充为园艺系，并增设史地系、博物系。川教院师生为把学校扩展成为一所具有文、理、师、农的综合大学积极奋斗，掀起“扩校”（即“改大”）运动，向国民参政会、教育部及四川省政府、省参议会请愿，建议为纪念抗战都城改名为陪都大学。在四川省参议会的支持下，省政府拨黄谷六万石给川教院，用于改建陪都大学兴修设备。当时各系教授阵容是庞大的，系主任有：国文系赖以庄，教育系罗容梓、王克仁，英语系熊正瑾、周考成，数学系郭坚白，史地系张圣英，博物系刘祖彝，农艺系王翊金、园艺系董时厚。为了配合“改大”需要，专门成立了扩校委员会，原拟设教育、文理、农学三院，全校师生一致努力，形成了扩校运动的强大声势。^[9]

抗战刚刚胜利，蒋介石又挑起内战，再次使中国陷入战争的苦难中。川教院的师生积极参加革命斗争，推动革命向前发展，为解放战争取得胜利作出贡献。

1946年1月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重庆学生



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校舍

举行了“一·二五”大游行，川教院的学生选出洪宝书等为代表到沙区爱国游行联合会参加了这次运动的组织工作，目的是为使会议能够顺利召开。游行示威对政协会议的成功召开起了促进作用，得到了全市人民和舆论界的支持，成为抗战胜利后重庆学生民主运动的第一个高潮。1946年底，北平发生了驻华美军强奸北大学生沈崇的事件后，抗暴运动在全国开展开来。川教院在“抗议美军暴行，揭露美蒋阴谋”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用活话剧、舞蹈、漫画、诗歌朗诵、讲演以及各种民间文艺把美蒋勾结发动内战以及美军残害我国人民等罪行表演得淋漓尽致，深受群众欢迎。1947年，川教院参加了由宁沪平津学生首先发起，逐渐由分散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革命风暴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1949年春“四二一”运动是解放前夕重庆规模

最大的一次学生运动，川教院有500多名学生参加了游行活动，他们高呼“向政府要饭吃”，“向政府要书读”，“活命是我们的最低要求”等口号。4月21日，学生举行全市大游行，还向西南长官公署请愿，学生们面对重重包围，面对荷枪实弹的军警以及他们的枪口、刺刀和水龙，毫不畏惧，昂首挺胸，高歌前进，最终游行以学生的胜利而结束。学生们经受了考验和锻炼，为迎接解放准备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川教院也获得新生。1950年，西南文教部将川教院的农科三系与私立相辉文法学院、私立华西协合大学合并建立为西南农学院；将教育、国文、史地、外文、数学、生物六系与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合并建立为西南师范学院。走过18个春秋的川教院之旅就此结束。

参考文献：

- [1] 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教员、职员、工警编制表，“川教院档案”，全宗0122，目录1，卷号331。
- [2] 《西南师范大学校史》编修组. 西南师范大学校史[M].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15页。
- [3] 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二十九年度秋季各系、各组、各级男女生人数统计表，“川教院档案”，全宗0122，目录1，卷号259。
- [4] 三十年度第一学期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学生人数报告简表，“川教院档案”，全宗0122，目录1，卷号253。
- [5] 三十年度第二学期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学生数报告简表，“川教院档案”，全宗0122，目录1，卷号327。
- [6] 四川省立教育学院职员编制表，三十一年十一月，“川教院档案”，全宗0122，目录1，卷号331。
- [7] 三十二年度二学期学生数，“川教院档案”，全宗0122，目录1，卷号474。
- [8] 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概况，“川教院档案”，全宗0122，目录1，卷号640。
- [9] 重庆市沙坪坝区地方志办公室. 抗战时期陪都沙磁文化区[M].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设，1989版，第54页。

(责任编辑：田朋朋)

郑兰华教授 1895 年 7 月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县新塍镇,1919 年夏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主攻化学及英、德文,获理学学士学位。1925 年秋至 1926 年秋,获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系主攻理论化学,获硕士学位。郑先生先后在长沙湘雅医学院、长沙雅礼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沈阳东北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南京金陵大学、上海医学院、重庆上海医学院和重庆大学任教。在重庆大学任教期间,曾代理理学院院长职务,并任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和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教授。1952 年调西南师范学院化学系任教授兼系主任,直到 1971 年 6 月逝世,享年 76 岁。

郑先生化学知识渊博,理论功底深厚,实验技术精湛。长期从事普通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理论化学、食物分析和化学教学法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环上最大拉力法测定液体表明张力》的合作研究论文发表后,所测定的数据与测定方

法,得到国际公认,收录在《国际数据表》(I.C.T)中。著有大学丛书《实验普通化学》、《毒气战争中的防护和救治》、《化学物质命名原则》、《为保证化学实验室的安全而奋斗》等著述,还与徐善祥教授合作编著有《英汉化

兰华芬菲

魅力永驻

编者按:郑兰华(1895-1971),浙江嘉兴人,全国著名化学教育家。1952 年调入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任化学系第一届系主任,是我校化学系的奠基者和创始人。1963 年被选为重庆市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记郑兰华教授

□文\刘迪志 周光明 曾国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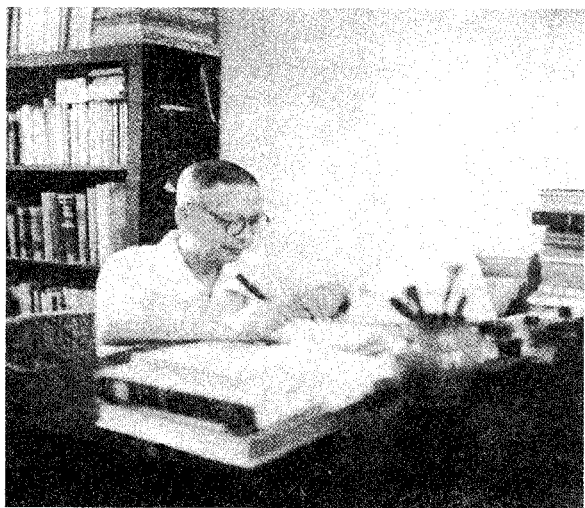
学新字典》。受高教部委托编写出版了《高等师范院校化学系无机化学试行教学大纲》(修正稿)供全国高师院校使用。先生根据大纲要求,著有《无机化学教科书》与之配套使用,为提高全国高师无机化学的教学质量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先生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重视科普知识的宣传教育,计划撰写与

化学有关的系列科普丛书《火》、《水》、《空气》等,可惜只有《火》一书出版面世。

郑先生毕生从事化学教育事业,是全国知名的、我校 1952 年仅有的两个二级教授之一,是西南师范学院化学系的奠基者和创始人,为化学系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2 年,先生主持化学系工作后,即提出修建化学系实验教学楼,并亲自参与设计。在学校党委和行政机关的关怀和支持下,

一幢具有化学学科特色的崭新的化学实验教学大楼,在 1954 年即宣告落成,至今风貌犹存。与此同时,先生将化学系从一个原来全系教职工仅 17 人,学生仅 55 人的小系,发展到 1962 年,全系教职工 90 名,



郑兰华从事化学研究

学生达 437 人的理科大系，为培养中学化学教师作出了重要贡献。先生热爱党和尊重行政领导，对学校党委、行政布置的工作，均详细笔记，如实传达，并结合化学系的实际，提出有真知灼见的贯彻意见。在行政工作中，举凡制定教学计划、师资培养规划、学科建设意见、后勤保障管理办法等，均亲自草拟，亲自定稿，从不叫秘书代劳。先生治教严谨，讲稿字斟句酌，讲解深入透彻，清晰准确，常运用辩证法观点，分析说明问题，注意启迪学生思维。先生重视化学史教育，倡导教学法研究，注重教学艺术，听先生讲课确是一大享受。先生重视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试题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十分灵活，绝无死记硬背的题目，考先生所命试题，及格尚难，高分更不敢企求，但学生都无怨无悔，心悦诚服。先生要求学生极为严格，非常注重实验技术的规范操作，对违反实验规程的学生，必须改正重做，直到认真改正为止。先生特别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课前帮助分析处理教材；上课时亲自听青年教师讲课，有针对性地作些记录；课后座谈，既满腔热情地鼓励青年教师追求进步，又实事求是地指出教学中的不足，进行具体指导和帮助。先生还利用业余时间，亲自辅导青年教师进修专业英语，要求每两周必须写出一篇学习英语专业书籍的读书心得，相互交流，以提高英语和专业水平，促进青年教师的成长。早在 60 年代初，先生就曾专门召开全系教师大会，作了“关于教师进修提高问题”的专题报告，要求每位青年教师制订进修提高规划，并逐一进行指导，要求做到博学多才，又红又专，为化学系青年教师的培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郑先生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和爱国主义者。早在 1932 年，即与著名化学家曾昭纶、戴安邦等一起，发起成立中国化学会，成为中国化学会永久会员之一，长期担任中国化学会理事、四川省分会副理事长、重庆市分会理事长，又是中国化学工程学会永久会员和中国科学普及协会会员。1952 年参加“九三学社”，任重庆分社委员。1963 年被选为重庆市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担任西南师范大学工会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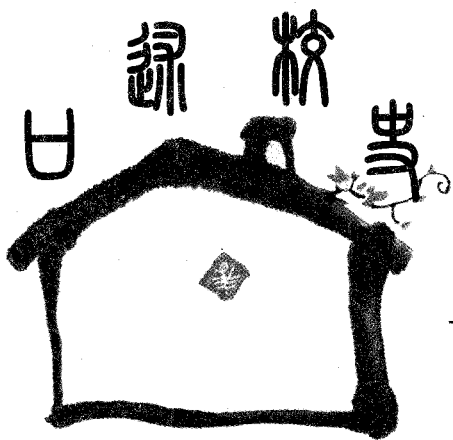
郑先生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就积极参加进步学生的爱国运动，不顾学校当局“缺课要扣分”的威胁，积

极鼓励同学一起参加游行示威活动。先生对国民党政权的反动统治和对进步学生的迫害极为不满。在重庆解放前夕，当时在重庆大学任教的郑兰华教授，听校长张洪沅先生说，国民党逮捕进步学生的黑名单上，有他的学生申佩瑯。先生听后立即回家，找来了一件蓝布长衫和两块银元，迅速赶到学生宿舍通知申马上离校，并安排在友人家中暂住，从而避免了此次劫难。1950 年，申佩瑯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医疗队，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总医院麻醉科主任。1932 年秋，当时在上海医学院任一年级班主任的郑先生，对一位实验技术差、入学考试时唯一的一个英文不及格的学生，本应劝其休学一年，用以补习英文。郑先生将这位学生叫到办公室谈话。这位学生说：“郑老师，我来学医是为了能做一个女医生，将来参军打日本鬼子。我没读高三就来学医，就是要早点学会本领，抗日救中国，我决不能留级啊！”郑先生听了这一番话被感动了，露出兴奋的神色说：“啊，真没想到，你这小小姑娘却有这么大的理想，难得难得，我十分高兴你有这样的爱国志气。那好，你努力吧。只要你期末考试及格，同意你争取早一年毕业，早点去打日本鬼子。”当时，这位学生真没想到一向要求严格的郑先生居然同意了她的请求，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表示一定要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好好念书。后来这位学生顺利毕业了，立即到南昌参加了新四军，后曾任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

郑兰华教授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楷模，是师生们学习的光辉榜样。先生在长达半个世纪的从教生涯中，特别是在主持和领导西南师范大学化学系的工作中，以渊博的学识，精湛的教学艺术，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格魅力，深深地感染了化学系的每一位师生，先生所倡扬的精神，已成为今天化学化工学院前进的动力和弥足珍贵的财富，激励全体师生为把化学化工学院建成全国知名的学院而努力奋斗！

（本文选自《缙云山下一支歌》（第一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责任编辑：田朋朋）



编者按：2008年12月23日，校档案馆馆长潘洵、副馆长蒋涛探访了曾于1973年至1984年担任原西南农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党委书记的李兰同志。采访中，她回忆了担任书记期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校发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她认为，校史编写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求真、求实。从本期开始，我们将陆续选登有关学校发展历史的口述资料。

求真 求实

揭校史谜团

口述 / 李兰 整理 / 胡小京

我是1956年调到原西南农学院任党委副书记，1973年被任命为党委书记到1985年离岗任中共重庆市顾问委员会委员，1993年离休。对原西南农学院的情况最了解，特别是历次政治运动，因为我是学校的主要负责人。遗憾的是，过去西农编校史从开始到定稿、出版没有任何人找过我，一直到出书也没有给我一本。2008年12月校档案馆的同志想约我谈原西农有关校史的问题。为了谈话，我托蒋莉蓉同志找本校史。打开第一页一看，我是校史的“顾问”，令我哭笑不得，现在才知道是“顾问”。

因为过去从未看过校史，现在粗略翻了一下，感到不少问题，多处与历史不符。有些方面有意夸大错误，把不是运动中的错误也要写进去，把当时一些正确的克服困难的作法也当作错误写入，如其中第五节“错误地开展党内反右倾斗争”一文，类似的问题还不少。总之违背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来写校史。其中一些问题如有必要，以后再谈。

下面我就校史编写中记载不详、遗漏或有误的地方浅谈几件事。

一、解密李世俊担任党委书记之迷

李世俊早年从事晋绥军屯垦事业，抗日战争开始后投奔延安，主要负责陕甘宁棉花生产和开辟南泥湾农业生产工作。1957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高等院校领导的指示，为加强农业部直属的八所高等农业院校

的领导，李世俊被调往重庆任西南农学院院长。但后人对李世俊任党委书记却未曾工作一日甚为不解，校史中记载得也不够详细。当时的情况是，1959年，我校原第一任党委书记张一夫逝世后，党委书记暂无人选，中共重庆市委决定由时任副书记的我来主持党委工作，1961年市里派来刘海旺任副院长，他是名老红军，另一位副院长何文俊是党外人士。当时学校领导班子就是我们四个人。为了便于开展学校工作，健全体制，1961年我和刘海旺向省委、市委请示，建议党委书记由李世俊院长兼任。1962年7月省里正式下达任命李世俊为党委书记兼院长的文件。不幸的是，1961年11月，李世俊院长被检查出身患肺癌，虽然他在1962年3月做完手术，但身体康复得很慢。在1962年7月接到任命通知时他已病危，我向他宣读通知时他已没有反应。1962年11月24日李世



张永清（原西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李一夫夫妇（1950年4月）

俊因病逝世。这就是他担任书记职务而未能工作一天的原因。

李世俊逝世后,市里和学校都未曾开过所谓的“公祭会”,而是在重庆市政协礼堂由市委主持召开了追悼会。因此,校史中记载的“公祭会”一事不是事实。

校史中另一件与李世俊相关的事件也与事实不符。校史中记载的关于“1960年学院按照中共四川省委和重庆市委发出的指示,在学院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把反对浪费粮食作为运动的重点,工作组深入食堂,院长李世俊亲自负责这一工作,并搬到厨房去住……”记载有误。首先,“三反”、“五反”的时间是在1951年至1952年期间开展的,而且运动只是在学院相关主管部门进行调查,并未在全校开展运动。李世俊深入食堂,并非进行“三反”、“五反”运动,而是关心学生是否能吃饱的问题,同时也了解一下食堂存在的问题,避免食堂出现浪费等不良现象。李世俊进食堂是解决学生吃饱饭的问题,却被记载成是搞“三反”、“五反”运动,这与历史事实不符。李世俊平易近人,且一直保持着延安精神和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在三年自然灾害的特殊时期,他身体力行,提倡多种瓜菜补充粮食不足来度过难关,对当时师生克服困难、度过难关,产生了很大影响,深受广大师生的欢迎。

二、师生共同努力,抵制学校搬迁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给全国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和内乱。“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科学和文化,首先拿高等学校开刀,使高等院校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的重灾区,农业院校又是重灾区中的重灾户。全校师生在极“左”高压的严峻形势下,始终没有屈服,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抗争,最大程度的减轻了“文化大革命”对学校教学、科研等工作的破坏,避免了学校被分散、解体的命运。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传出一条毛主席语录:“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考虑到学校若分散搬迁到农村,将严重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与科研,最严重的后果是学校极有可能在搬迁过程中解体。为了避免出现此种状况,我及时向农业部提交了一份关于学校不宜搬迁的报告,重点指出:学校建校就是在农村,距离城市一百华里。学校原来在夏坝,1954年才搬到这儿,这儿离解放碑有一百华里,周围全是农村,学校本身就在农村,没必要从农村再搬到农村,而且刚搬来这儿不久,如若再次搬迁,很多设施需要重新建设。报告送出后没有批复,但也没有下达搬

迁的通知,此事就拖了下来,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逃过了搬迁的一劫,而“一百华里”却成了我在“文革”中被批判反对毛主席的主要“证据”之一。

1971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由“四人帮”炮制出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全盘否定了17年来教育工作的成就,认为:解放后17年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教师队伍的大多数人“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是“两个估计”。《纪要》被用以指导全国高校工作。1972年四川省委教育工作会议决定将西南农学院分散到宜宾、江津、南充三个地区办中专。全校教职工奋起挽救,坚决反对这一决议。侯光炯教授还亲自带着全体教职工的意见,到四川省委革命委员会找相关领导,公开反对分散到各地办学。学校50余名党员联名上书中共四川省委,据理力争,反对学校分散办学。1974年国务院科教组下达通知,同意恢复学校原来的办学模式。



西南大学纪念建国60周年表彰有突出贡献者

60名代表,前右一为李兰

学校从1974年开始学习“四人帮”炮制的“朝阳农学院经验”。1975年4月,中共四川省委下发《关于我省农业院校学习辽宁省朝阳农学院经验座谈会情况报告》通知:“省委关于农学院、农校学朝农要积极试点,总结经验教训,逐步扩大的指示,符合我省的实际情况,应坚决贯彻执行”。“西南农学院去南充、万县与地区农校统一办社来社去试点班,今后逐步过渡为‘朝农’式的地区农学院。从今年起,我省农学院不再招收由国家分配的普通班学员。”学校根据省农业局指示,于5月制订了“1976—1985年教育规划”:“我校服务的地区是南充、达县、万县、涪陵、宜宾(包括自贡)、内江、江津和重庆,并

(下转第60页)

西大学子参观校史展览馆感言

编者按:2007年10月,西南大学校史展览馆在原西南师范大学、原西南农业大学两校校史馆基础上重新开馆,地位于田家炳教育书院七楼,面积约四百平方米。校史展览馆多角度、全方位、系统地展示了西南大学的悠久历史和学术积淀,优良的办学传统和丰硕的办学成果。她不仅是我校对外宣传交流的窗口,更是对学生进行“知校、爱校、兴校、荣校”教育的重要基地。本期《葭葭之声》选登了部分学生参观校史展览馆后的感言,其他参观留言将在以后的刊物中陆续选登。



2009年9月,09级新生在校史馆参观西大发展历程

上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
 学行天下，善其身而善天下
 ——傅新

学于西南，行于天下
 ——杨丹

唯似名流建功业，甘伴学堂乐此生。

——08师范生 Acauc

追梦到此，圆梦在此，我将以此为起点，奋斗不止

药学院 秦胜

初识西大是满眼的绿，而此刻是心潮涌动，激动万分。

——赵栲卓

08级 思政班

假如我死了，连羽毛也要腐烂在西南大学这片土地上。

——杨程智



校史展览馆讲解员为新生解说校史

西南大学的四年不一定是我最幸福的时光，但一定是我最怀念的四年。

——申坤琦

从历史的角度看历史，震撼。

从理想的角度看理想，奋起。
08生科一班
刘超



新生跟随讲解员逐一参观校史展板各版块内容

开始时，我曾有许许多多的怀疑，但现在，我会说“不”，因为它除了美丽，还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天堂。

08级数统1班 吴定章

在这美丽的地方洒下汗水，放飞希望收获美好的明天，让我们一起高喊

加油！We are the best！

08级外国语学院
张蓉邦

(责任编辑：李金芳)

丽娃河畔的历史记忆

——记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

□文 / 洪秋冰

原以为，华东师范大学位于上海这座中国最国际化的都市，也会随之沾染洋气。没想到看到的华东师范大学网站首页，却显得一片简洁，而渐变的翠绿色标头，也给人生机活力之感。档案、校史信息网，标头的颜色却由充满历史厚重感的褐色渐变成浅蓝色，并不断闪烁的科技之星嵌在标头内，寓意华东师范大学档案、校史信息网不断与时俱进。

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成立于1988年6月，直属校长领导，是学校档案工作的职能部门和集中管理、提供、利用学校档案的基地。馆库建筑面积983平方米，配有档案密集架、空调机、录音机、录像机、翻拍机以及微型计算机、扫描仪等设备，已全面实现了计算机管理。现在馆内设现代技术室(办公室)、档案收集指导室、档案保管利用室，另设校史展览室，介绍校史、人物。图文、声像并茂，是学校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窗口。经过十几年来的努力，截止到2004年，档案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97年6月，通过国家档案局考评，被授予档案管理国家一级单位称号；1997年9月，以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形式与校史党史办公室实行合署办公；1998年11月，被评为上海市学校档案工作先进集体；1999年3月，被评为上海市“三八”红旗集体；2004年3月，被评为“上海市档案系统先进集体”。

到2004年底，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共计67297卷，166316件，排架总长度为1228米。难能可贵的是它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华东师范大学整个历史发展沿革的八个档案全宗，即大夏大学、光华大学、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上海南林师范专科学校、上海南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上海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上海教育学院、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从而为编史修志，落实政策，出国公证、办理毕业生学籍证明以

及编写和出版关于华东师范大学发展沿革历史的书籍如《光华的足迹》、《大夏大学建校七十周年纪念》、《华东师范大学大事记》、《华东师范大学校史文集》、《徐志摩传》、《华东师范大学年鉴》、《华东师范大学校史(1951-2001)》、《丽娃河畔逸事》、《我的丽娃河》等提供了大量的凭证和依据，获得档案使用者的好评。

大厦大学和光华大学是华东师范大学办学历史最久的前身，因此这两个档案全宗就比较详细，都分为几个版块来介绍。如大厦大学的档案版块分为：历任校长、校景回顾、校歌、校徽、校训和大厦烈士。点击各个版块查看，都有详细的介绍，特别是大厦烈士版块，对抗战期间大厦大学的二十名烈士都有图文介绍。如此完整的史料，反映了华东师范大学人对先烈的缅怀，对历史的尊重。大厦大学的全宗(1924.7-1951.10)共有档案1,323卷，学生学籍和成绩单18,155份。档案主要内容有：民国时期教育部对该校工作的训令和来往公文；学校规章制度与组织机构设置；校务委员会和董事会会议记录；学校概况、年鉴、周报以及学生名册、校友名册、教职工名册和照片等。而光华大学档案版块则稍有不同，它保留了历任校长、校景回顾、校歌、校徽、校训这几个版块，还增加了《私立光华大学分设成都始末记》序、张寿镛与光华大学、光华大学成都十年大事记和光华大学廿载简史版块。这几个版块更是详尽地介绍了光华大学的办学历史。光华大学全宗(1925年9月——1951年10月)共有档案1,268卷，学生学籍和成绩单9,931份。档案主要内容和种类与大夏大学全宗基本相同。另有《光华年刊》反映抗战时期学校迁往成都分部情况的“成都十年记”(1938年7月——1947年6月)和光华附中的部分档案。

其他六个档案全宗，依据自身特点而介绍，显得各

有特色。

经过长年累月的变迁,当年战火纷飞期间的学籍在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仍能查找到,真的不简单!档案保存十分完整,这是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的第一个特点!

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的第二个特点,可说是她的国际化。这和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上海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中国最国际化的都市,与世界各国交流频繁,因而位于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在对外交流以及世界史研究方面占据了天时地利。而事实上,华东师大的世界史,尤其是国际冷战史的研究,的确是居于国内领先水平的。因此,她的档案馆特意开辟了“冷战档案”。在其开放档案里,按国别分为:美国、俄国、中国、日本、越南、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德国等,每个国家都有相关的资料供读者查询;按研究中心分有:威尔逊中心国际冷战史项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冷战史中心、哈佛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乔治·华盛顿大学冷战研究组、佛罗伦萨大学马基雅维利研究中心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这些网站链接进去,全是英文介绍和相关英文研究成果,读者可从中查获最新相关档案信息,这对于国内的冷战史研究不无裨益。

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她的地域特色很强。华东师范大学位于美丽的丽娃河畔。涓涓的丽娃河水缓缓地流过学校,见证了这所名校的发展沿革,悄无声息地记录下了它的点点滴滴,因此,也给档案馆留下了许多掌故。所以,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特意设置了“丽娃掌故”这个栏目,让读者了解发生在丽娃河畔华东师范大学校内的趣闻。在这里,我们了解到校园内的毛主席塑像的来历,回溯了第一座毛主席塑像的建造,了解到文学大师鲁迅在大厦大学和光华大学与学生聊文学与社会……

(上接第 55 页) 力争在 1978 年前把八个地区的农学院建起来。学校又面临即将分散的危险。全体教职工纷纷反对与地区农校合办,认为中专与大学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培养方式等存在很大差异,不利于中国科学的发展前途。为了争取不搬迁,我便去找省委分管农业的领导向他汇报学校情况:“文革”后学校才恢复,如果搬迁,再建一个学校肯定省里要投不少资,而且短期内也不可能建造。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不是由农村往回搬吗?我们还要搬出去。这样做不利于国家,不利于办好农学院。后来我又去找了管文教的省委书记。他说现在省委并没有作出要你们搬迁的决定。这个

为了更简便地查询华东师范大学近几年来,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的发展足迹,档案馆还开设了“师大年鉴”,点击所要查看的年份的年鉴或输入所需查询的年份,轻轻一点“查询”,即可看到该年份学校发展的点滴了;随着数字化管理的引入、运用,读者还可以通过视频点播来观看学校的新闻、专题报告和观摩教学电影;档案馆在“冷战档案”里还开设个人网站,如著名历史学家杨奎松、沈志华等的个人网站。这些网站,延伸了师大档案馆的内涵外延,丰富了档案馆的内容,为读者提供了更广阔的知识空间。

“无一事而不学,无一时而不学,无一处而不学,成功之路也。——朱熹。”勤劳的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就是秉承这句名言,按照党的十六大报告要求——“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树立起学习光荣、学习高尚的观念,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不断提升自身的素质,从而使华东师大的档案工作形成自身特色,并不断取得新进展,也不断为读者提供优质服务。



位于华东师范大学内的毛主席塑像

(责任编辑:刘广生)

问题暂时不必再谈了。后因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学校才免遭再次被撤散的危险。我觉得学校领导班子在抵制学校搬迁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想了很多办法,是尽了责尽了力的。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多次面临被撤散的危机,全体教职工没有因困难退缩,而是奋起挽救,据理力争,坚守岗位,创造最佳的教学、科研成绩。在危急关头,学校领导敢于负责,勇于坚持,积极探索,这是值得肯定的。总之,对待历史,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不能盲目肯定一切,或是否定一切,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

(责任编辑:张晓华)